

# 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 組織體系（1932-1943）

黃 福 慶

## 摘 要

滿鐵調查部自創立至解體（1907-1945）所走過的歷程，相當曲折，因為滿鐵並非一般的營利公司，它擔負著國家使命，因此，調查部的任務自然就與一般營利公司的調查機構不同，也就是說調查部同時兼有以一般營利立場與肩負政府所賦予的使命的雙重性格。

調查部的組織體系隨時局的推移而有所調整與變化，其調查課題與調查理念，也同樣因時局的變化而異，當然這種變化與日本政府的國策息息相關。本文旨在將 1932 年至 1943 年之間，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作有系統的整理，並探討各階段的調查方針與任務。

# 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 組織體系（1932-1943）

黃 福 慶\*

- 一、前 言
- 二、大連本部的調查組織體系
  - (一)關東軍主導下的經濟調查會（1932.1-1936.9）
    - 1.成立緣由及其組織
    - 2.經濟建設計畫的調查及立案
  - (二)低迷狀態的產業部（1936.10-1938.3）
    - 1.任務
    - 2.編制
  - (三)重振調查功能的調查部（1938.4-1943.5）
    - 1.松岡洋右的心結
    - 2.調查部的改組、擴充
    - 3.基本任務與調查方針
- 三、各地區的調查組織體系
  - (一)北滿經濟調查所
  - (二)新京（長春）支社
  - (三)北支經濟調查所
  - (四)上海事務所
  - (五)東京支社
- 四、結 論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一、前 言

滿鐵調查機關（名稱與組織屢有不同，一般統稱調查部，以下即用此稱）自創立至解體（1907-1945）所走過的歷程，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實是一部曲折也讓當事人引以為傲的歷史。滿鐵並非一般的營利公司，它擔負著國家使命，因此，調查部的任務自然就與一般營利公司的調查機構不同，換言之，調查部同時兼有以一般營利立場與肩負政府所賦予的使命的雙重性格。

調查部的歷史若以時局的變遷來區劃，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 1907-1932，此時期局勢比較安定，來自軍部的干預少，較能作自主性的調查。第二期 1932-1939，這期在組織上歷經經濟調查會（簡稱「經調會」）、產業部及調查部的前期。當時東北的主導權操控在關東軍，因此，調查部的調查活動亦幾乎全由關東軍主導，但調查活動的活絡卻也開始於這個時期。第三期 1939-1943，此時期處於中國抗戰的高峰期，又有太平洋戰爭發生，調查範圍遂擴大至全東亞，調查課題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一切以戰時體制的調查研究為前提。為因應時局與調查之需，調查組織一再擴充，成為一個組織龐大的調查機構。

調查部的組織體系隨時局的推移而有所調整與變化。一般咸認滿鐵調查部只是指設於滿鐵大連總社內的調查部，其實，長江以北的各重要據點均部署調查網，所以調查部的組織體系不僅龐大而且也很複雜。本文旨在將九一八事變以後滿鐵調查機關（含大連本部及散佈各地者）的沿革，作有系統的介紹。至於本文探討的時限所以定為 1932 年至 1943 年，這是因為這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動最高漲的時期，調查部在這個時期任務最為艱鉅，為因應戰時體制，曾作大規模的綜合調查。而本文研究的下限所以僅止於 1943 年，是因為調查部的調查人員遭受兩次檢肅（1942 年及 1943 年）後元氣大喪，過去的調查「雄風」已不復存在，1943 年以後的調查部等於處在解體狀態之中。

## 二、大連本部的調查組織體系

### （一）關東軍主導下的經濟調查會（1932.1-1936.9）

#### 1. 成立緣由及其組織

滿鐵自1907年4月成立調查部至1945年8月因日本戰敗而解散，在將近四十年的歲月中，因常受到來自外部的干預，所以其任務也因時而異。駐東北的最高權力機關——關東都督府（1906年8月由關東總督府改組而來）一直是滿鐵的監督機關，而關東都督府的最高長官則由軍人出任，因此，滿鐵的調查任務很難避免要配合關東都督府的意向。1919年4月，廢關東都督府設關東廳，同時並將關東軍加以分離而獨立，形式上關東軍僅擔任關東州及滿鐵沿線的守備任務，但由於關東軍的勢力日益壯大，甚至發展到控制東北全境，儼然成爲東北的統治者，其干預滿鐵的調查活動，是很自然的事，這種傾向自1927年以後，日益強烈。<sup>①</sup>

1927年4月，田中義一組閣，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即在日本外務省召開東方會議，並決定「對支政策綱領」，其內容即已指出「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因與國防及國民生活上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我國不僅要特別注意，而且對於維持該地和平，經濟發展，作內外人安住之地，身爲鄰邦，深感有責任」，<sup>②</sup> 很顯明地主張「滿蒙分離政策」。此時，在關東軍內部對於「滿蒙分離政策」的主張，也日趨強烈，曾嚐試向中國方面要求東三省自治，建設新鐵路、開墾土地、開採礦山、設置財政、軍事日人顧問等，而且關東軍認爲將東北從中國加以分離，把它變成殖民地化，爲當然之事。<sup>③</sup> 關東軍甚至於計畫一旦占領東北時，對占領地區的行政方法，作一番研究。1927年7月，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不僅命佐久間亮三研究有關在滿蒙占領統治等問題，<sup>④</sup> 而且還要求滿鐵調查課的協助，請當時的調查課長佐田弘治郎、法制股主任松木俠、

①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頁364-365。

②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101-102。

③ 1927年6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策定〈對滿蒙政策に關する意見〉，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出動政策史資料》。引自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65。

④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への道》第一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366。

俄羅斯股主任宮崎正義等各依專長作全面性的調查。<sup>⑤</sup> 關東軍的積極態度，由上列事例中不難看出，尤其石原莞爾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突出。後來滿鐵調查課爲了配合「異日日本有機會侵略東北」而對東北的馬賊以及資源所作的研究，留下不少成果，這些亦出自石原的構想與要求。<sup>⑥</sup> 這一切在在說明關東軍的觸角已逐漸伸入滿鐵，並利用滿鐵調查人員的智慧作廣泛而深入的調查，以爲掠奪東北而鋪路。

再就滿鐵方面的調查方針而言，也有慢慢配合關東軍行動的趨勢。1927年7月，山本條太郎與松岡洋右分別就任滿鐵總裁與副總裁，他們兩個人鑑於經濟情勢的推移及實現國策，對於滿鐵的經營政策主張「實務化與合理化」，藉以振興公司業務，並要滿鐵所屬各機關毫不保留地發揮功能。其中對調查機關的活動，認爲不應僅作桌上調查及蒐集一般的社會參考資料，應該把它視作能提供對滿鐵業務直接而有效之資料的調查機關。基於這個理念下，於原有的調查課以外，於1927年11月另成立直屬於總裁的「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1929年8月，山本卸任時裁撤）。該委員會係由委員長（石川鐵雄）及若干委員組成，在委員會之下置第一部（專司交通、港灣、工場、電氣）、第二部（司實業）、第三部（司資源關係）、第四部（司社會、地方系統）等四部及庶務。<sup>⑦</sup>

「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的設置目的在於(1)調查滿鐵各機關過去對滿蒙的經濟情事懸而未作調查的事項而急須調查者，(2)從事經濟調查最基本的統計調查。<sup>⑧</sup> 從以上設置要旨可以看出，這是山本與松岡共同企畫下的對滿政策的一種表現，而且他們也期待把經濟調查的重點放在滿蒙資源的開發上。如果將當時滿鐵調查機關的方針與關東軍的策略加以對照，可以說相當類似。

1927年前後，滿鐵調查課與關東軍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滿鐵當局經常接受來自軍部的委託調查，相對的，軍部也常給予滿鐵在調查上的方便。<sup>⑨</sup> 不

⑤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65。

⑥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東京：龍溪書舍，1976年），頁2372-2373。

⑦ 同上書，頁2375-2376。

⑧ 同上書，頁2376。

⑨ 同上書，頁2373。

僅如此，兩者在人員上也在進行交流。當時在關東軍司令菱刈隆的麾下擁有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三名積極主張滿蒙分離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們與調查課的高層人士保持密切關係，且互派連絡員，例如關東軍的佐藤勇助出任滿鐵囑託（特約人員），而滿鐵也派木村正道為關東軍囑託，如此關東軍可以直接與調查課的活動發生連帶關係。<sup>⑩</sup>

事實上，1930年3月，石原莞爾在滿鐵調查課的演講備忘錄中，已具體地表示一旦占有東北地區時，要求調查機關全面參與。<sup>⑪</sup>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10月），石原在奉天透過軍部囑託松木俠對調查課的宮崎正義及奧村慎次傳達消息稱，為了滿洲新政權各種政策的立案，關東軍當局擬成立一個組織，然而人材由滿鐵供應，形式上隸屬滿鐵，實質上應在軍部指導下進行活動。<sup>⑫</sup>由此可知，此一組織的設置計畫，是與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同時進行的。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滿鐵調查課審視周圍情勢，除進行有關情報的活動外，均盡量避免積極的調查活動。蓋當初滿鐵對關東軍的侵略行動反應消極，因此沒有立即呼應它。<sup>⑬</sup>然而不久，卻有不少調查人員應關東軍之邀參與各種調查活動，關東軍乃於1931年11月於司令部內設置統治部（1932年2月改稱特務部），而為了配合關東軍的控制東北政策，滿鐵調查課亦於瀋陽設置「奉天出張所」。<sup>⑭</sup>

日軍攻打錦州（1931年10月8日）是關東軍成立新調查組織的轉捩點，1932年1月3日錦州淪陷，關東軍認為建立新國家（即「滿洲國」，1932年3月1日成立）的機運已漸臻成熟，並深感「為了新國家的建設及其健全發展，無論在政治、經濟、外交或文化上，必須給予周詳的指導及援助」，因此，認為有必要設立一個「調查有關滿蒙各項情事、並在提供建設方策及計畫的研究立案等方面，能應軍部諮詢並與之合作」的強而有力的綜合調查研究機構。<sup>⑮</sup>

關東軍的意向，無非想設立一個能主控的研究調查機關來配合它的滿蒙

<sup>⑩</sup>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40年），頁159。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東京：勁草書房，昭和39年），頁159。

<sup>⑪</sup>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への道》別卷，資料編，頁90。

<sup>⑫</sup> 野間清，〈滿鐵經濟調查會設置前後〉，《歷史評論》169號（1964年9月），頁74。

<sup>⑬</sup>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66。

<sup>⑭</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1。

<sup>⑮</sup> 同上書，頁2381。

政策，適當時滿鐵內部也有人主張應擴大與加強調查課，網羅滿鐵各單位的專家，使它成爲一大經濟調查機關，並且動員二十幾年來所累積的滿鐵的所有智慧及資料，與關東軍互相合作參與東北的經濟建設。<sup>⑮</sup> 情勢發展至此，新的調查機關已呼之欲出，只待有心人居中撮合，而暗中活躍於兩者之間並促成設置「經濟調查會」的中心人物就是宮崎正義。

宮崎正義曾由滿鐵派赴俄國留學，目擊俄國十月革命，返回調查課後擔任「俄國班」主任，對俄國問題有深入研究，其冷靜的分析力甚得大藏公望的賞識，大藏擔任滿鐵理事時將「俄國班」擴大，宮崎並接受有「參謀本部俄國通」之稱的小磯國昭的委託，完成將近五十卷的「俄國兵要地誌」。該書精確度之高，令陸軍當局驚嘆不已。<sup>⑯</sup> 宮崎與石原的交情甚篤，石原的意向幾乎透過宮崎傳達，惟宮崎在調查課內的人緣不佳，符合他的人不多，於是抬出滿鐵理事十河信二居間斡旋促成此事，因爲十河亦熱衷於滿洲建國。在十河等人的策畫下，於1932年1月18日由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正式具函滿鐵副總裁江口定條，要求正式設立經濟調查機關。滿鐵當局即於1月21日召開「重役會議」（理事會議）討論此事，會中副總裁江口定條及理事木村銳市等雖持反對意見，但十河信二堅持主張一切爲「貢獻滿洲建國」，力排眾議，終於議決應關東軍要求正式設立「經濟調查會」（以下簡稱「經調會」）。<sup>⑰</sup>

1932年1月21日成立「經調會」同時，「重役會議」即已訂定「經調會」的根本目標及方針在於謀「滿蒙本身的經濟開發，改善日滿經濟關係的合理化及扶植日本的「經濟勢力」，是把它定位於站在國家的觀點擔任全東北的經濟建設計畫。<sup>⑱</sup> 換言之，「經調會」在九一八以後堪稱爲關東軍的經濟參謀本部，它是依據滿鐵的特殊使命作爲一般經濟計畫的調查立案機關，負有開發東北及東亞經濟，完成國策等各項事業的任務，所以其任務非僅僅如一般營利公司的立場。<sup>⑲</sup>

<sup>⑮</sup> 同上書，頁2382。

<sup>⑯</sup>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160。

<sup>⑰</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2。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67。

<sup>⑱</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2。

<sup>⑲</sup> 滿鐵產業部編，《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東京：龍溪書舍，1979年），頁4。

「經調會」成立之初，滿鐵總社的調查機關係採行雙頭馬車，即除「經調會」外，原來的調查課仍然保留，當時的科長是伊藤武雄。因大部分調查人員已轉至「經調會」，所以調查課如同被去掉骨頭的形骸，其主要工作僅處理太平洋問題調查會有關中國的事宜及提供資料給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等無關緊要的工作而已，然而調查課仍於 1932 年 12 月受到裁撤。<sup>②</sup>

「經調會」由於任務特殊，故其組織採行委員會與各部二段制，委員會之下設有(1)支那經濟調查委員會，(2)國線調查委員會，(3)葫蘆島築港調查委員會，(4)特產對策委員會，(5)銀委員會，(6)滿洲財政問題委員會，(7)附帶事業調查委員會等七個分科小委員會，此七個分科委員會徒具空名，無實質任務。而實際擔任調查任務的是設於委員會之下的六個部門。茲將「經調會」設立當時的各主管及各部任務列表如下：

委員長 十河信二		副委員長 石川鐵雄	
部 門	主 管	調 查 事 項	構 成 班 別
第一部	宮崎正義	1.有關一般經濟之調查立案 2.不屬他部之調查事項	滿洲經濟班、東亞經濟班、統計班。
第二部	奧村慎次	農林、水產、畜產、工礦業之調查立案。	農業班、出迴班、林業班、畜產班、工業班、礦山班。
第三部	佐藤俊久	有關交通之調查立案。	第一、二鐵道班、道路班、水產班、水理班、都市計畫班。
第四部	中島宗一	商業及金融	貿易班、商業班、特產班、金融班。
第五部	岡田卓雄	一般法政、勞工及殖民。	諸稅班、外事班、法制班、勞動班、殖民班。
第六部	野中時雄	北亞地區一般經濟。	第一、二北方班、資料班。
幹事室	貴島克己 (幹事)	1.處理會務，2.綜合立案事項	

註：上表係依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 2382-2387 及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 370，繪製而成。

②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 191-192。



「經調會」在體制上雖直屬滿鐵總裁，是滿鐵的一個單位，實質上它猶如獨立機關，就如滿鐵社史所稱，「經調會」雖屬社內機關，惟實質上是作為國家機關站在國家的立場擔任整個東北的經濟建設計畫，<sup>22</sup> 這意味著「經調會」在實質上是關東軍的一個單位，是在其指導下從事調查立案等活動的。「經調會」的調查及立案的根本目標及根本方針，按規定須經滿鐵「重役會議」承認，表面上一切方案似乎代表滿鐵的意志，事實上，這些方案並沒有經過滿鐵相關組織的提議或審議，而由關東軍直接交辦的。1932年7月，當石原莞爾從關東軍他調之際，寫給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的備忘錄中曾提到有關「滿洲開發計畫的決定及其實行」的問題，其中指「經調會」是關東軍的經濟參謀部，而其部員均為軍司令官的幕僚，根本方針由特務部決定，「經調會」據此計畫立案。<sup>23</sup> 由此可知，滿鐵當局對「經調會」的活動是無權過問的。相對的，在關東軍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具有二十四餘年傳統歷史的滿鐵調查部，他們一意逼迫滿鐵成立一個由其主控的新機構。由於「經調會」的成立，象徵著後藤新平一向所重視的科學的調查機關至此而解體，講求科學精神的調查，也被法西斯的鐵蹄所踐踏。

## 2. 經濟建設計畫的調查及立案

「經調會」自1932年1月成立，至1936年10月因改組併入產業部，在這四年多期間，毫無疑問是受制於關東軍的。「滿洲國」之成立，關東軍最感迫切的莫過於對東北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作詳盡的調查以及完成各方略的立案。前面已提到，「經調會」在關東軍的權力下是從屬的存在，所以調查課題的選擇乃至調查的方法，無不配合關東軍的意向。<sup>24</sup> 「經調會」的經濟計畫立案約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1932.1-1933.3，此期主要在於九一八事變後各緊急對策的立案。「經調會」成立之初，即提出(1)融合日滿經濟為單一體並確立兩者經濟的自給自足，(2)確立國防經濟（開發國防資源），(3)人口勢力的扶植，(4)滿洲的重要經濟部門應置於國家統制下，勿讓其自由放任等四點經濟開發計畫方案，<sup>25</sup> 其

<sup>22</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2。

<sup>23</sup> 野間清，〈滿鐵經濟調查會設置前後〉，《歷史評論》169號（1964年9月），頁75。

<sup>24</sup> 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年），頁125-126。

<sup>25</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2。

目的在於建立日滿經濟關係的合理化及扶植日本勢力。當時「滿洲國」剛成立（1932.3.1），各種制度尚未建立，經濟建設計畫亟待立案，據統計，「經調會」的立案件數 829 件中，在此時期完成的約占 40%，調查人員的忙碌情形不難想像。<sup>⑳</sup>

1932年5月，「經調會」提出「滿洲經濟統制方策要綱」，關東軍根據該要綱決定了「滿洲經濟統制根本方策案」及「有關日滿經濟統制實施上基礎要件之意見」，及至12月，「滿洲經濟建設第一期綜合計畫案」及其「理由與說明」完稿。1933年1月，宮崎正義、安盛松之助、齋藤征生等依此彙總完成「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1933年3月1日「滿洲國」發表的「滿洲經濟建設綱要」係以「經調會」的試行方案為基礎，也是該調查會的綜合立案的成果。<sup>㉑</sup>

「經調會」在這一期內出現了一個研究會的組織，而這個研究組織對日後滿鐵的調查活動發生很大的影響，那就是1932年10月大上末廣的加入「經調會」，他以囑託身分配屬於第一部（主任為天野元之助）第五班。他入會後即與天野商議，糾合年青的調查人員及「滿洲評論」<sup>㉒</sup>的執筆人員，共同組織一個研究會，研究有關東北的經濟社會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是以「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中的論文或有關中國經濟的外國文獻作為教材，引進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來分析調查成果。

以大上末廣為中心的這種共同研究，是為了更正確地理解東北的經濟構造，而這些研究心得，多彙集於1933年版的「滿洲經濟年報」中。<sup>㉓</sup>像這種以馬克斯主義理論作為研究的方法在「經調會」產生一股勢力，對日後滿鐵調查機關展開的自主調查，具有很大的意義，也造成他們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或

---

⑳ 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アジア經濟》29-9（1988年9月），頁68-69。

㉑ 原覺天，〈滿鐵調査部とアジア〉，頁111-112。《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8-2389。

㉒ 《滿洲評論》創刊於1931年，總編輯為橋樑，一直發刊至1945年。該刊自1933年以後多由「經調會」的調查員執筆。

㉓ 《滿洲經濟年報》發刊於1933年，除1936年執筆者全被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動員而停刊外，直至1939年版為止共發行6年份。

對華政策採取批判的態度，最後導致軍部檢舉滿鐵調查人員事件的發生。<sup>⑩</sup>

第二期 1933.4-1935.12，這一期可視為經濟業務的轉換期，蓋至 1933 年 3 月，有關東北經濟建設方策的基本立案大致已完成，而「滿洲國」的行政機關也已臻完備，另一方面，滿鐵於 1932 年 12 月由於組織之修訂，增設計畫部，擔任「經調會」所完成的各產業部門的立案計畫。此時關東軍、「滿洲國」、「經調會」三者之間，開始發生微妙關係。「經調會」成立後，石原莞爾曾對板垣征四郎表示意見稱，關東軍參謀部為控制「滿洲國」，尤其為了「內面指導」經濟政策，應由參謀部第四課決定根本方針，「經調會」即依該方針立案基本計畫，然後由「滿洲國」遵循此基本計畫，制定實施政策與執行。<sup>⑪</sup>及至「滿洲國」逐漸成長，任職於「滿洲國」的日籍官員也漸多，而這些行政官員也多具有行政經驗，可以憑自己的能力計畫立案，對於過去關東軍的計畫立案的流程頗不以為然。同時也使「滿洲國」政府機關與「經調會」一部分人士之間產生嫌隙，「經調會」的使用價值漸失，因此有一部分「經調會」調查人員向當時「經調會」幹事押川一郎進言，認為立案等事宜應讓給「滿洲國」政府，讓「經調會」回歸原來的調查事業——基礎調查。<sup>⑫</sup>關東軍也認為「經調會」的任務大致已完成，有意把「經調會」回歸滿鐵，使其成為滿鐵的正規單位。1934 年 10 月滿鐵理事會議決議，自 1935 年 2 月起「經調會」正式成為滿鐵的正規調查機關。自此以後，所有關東軍委託有關蘇聯調查或兵要地誌等調查，「經調會」將它視為業務的一部分來處理，也因為如此，使「經調會」內部加速走向基礎的科學調查。<sup>⑬</sup>

1935 年 3 月大上末廣繼天野元之助出任「經調會」第一部主任，他認為如果要講求各種政策之間的整合，一定要以東北經濟社會構造的分析作為基礎，並強調綜合的基礎研究的必要性。大上在「經調會」滿洲經濟班（屬第一部）

<sup>⑩</sup> 三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 69。黃福慶，〈滿鐵調査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2 下冊（民國 82 年 6 月），頁 154-175。

<sup>⑪</sup> 三輪武，〈滿洲産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査會〉（I），《アジア經濟》28-1（1987 年 1 月），頁 57。

<sup>⑫</sup> 石堂清倫等，《十五年戦争と滿鐵調査部》（東京：原書房，1986 年），頁 29。

<sup>⑬</sup> 「經調會」成立時預定一年後解散，卻維持了四年多。見三輪武，〈經濟調査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 69。

的業務性質上有如下的記述：「該班是將滿洲國民經濟的機構作科學的調查研究為主要任務，看起來好像跟其他立案部門孤立專事於調查研究，其實它係基於闡明滿洲國民經濟機構的理論，並提示建設滿洲國民經濟的基本方針，為的是要使二部（指經調會第二部）以下的專門部門的各個立案有效用而給予每個立案有機的關連性提供手段」，<sup>34</sup> 反映出大上末廣等一批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調查人員的調查方向。

「經調會」在關東軍的主導下，致力於「滿洲國」的經濟建設立案之際，以大上為中心的調查人員以「科學的調查研究」或「理論的闡明」為訴求，分析東北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構造，站在純學術性的立場作調查研究，開啓了滿鐵調查機關自主性調查的先鋒。這當然是與滿鐵調查部內存在著傳統的自由空氣，加上當時「經調會」幹部及各部主查（負責人）受過大正民主的洗禮而思想比較開放有關。

這一期因中日關係的變化，「經調會」的調查活動地區也有變化，1935年相繼訂立「何應欽·梅津協定」（6月10日）及「秦德純·土肥原協定」（6月27日），日本勢力已伸張至華北，日本軍部亦將華北政策的管轄權由關東軍移交給駐華日軍。上面曾提到，1933年以後東北的經濟建設計畫的立案大致上已完成，自此以後，「經調會」的調查活動開始指向華北，1935年3月，「經調會」之增設第六部，滿鐵總務部之設東亞課，均為配合此一策略而來。<sup>35</sup> 至於日本軍部主管經濟的參謀池田純久，認為華北經濟開發計畫的立案，非借助於「經調會」無法完成，乃與關東軍主管華北問題的第二課參謀田中隆吉商議，決定借重「經調會」的人材，於1935年7月完成「華北經濟調查班編成要領」，約與此同時，駐華日軍司令部也透過關東軍正式轉達滿鐵，要求派遣調查班從事「華北經濟調查」。滿鐵當局於是派遣乙、丙囑託班前往支援。乙囑託班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共派遣145名，他們是由「經調會」、鐵道總局、撫順炭礦、地質調查所、中央試驗所等機關的人員編成，他們的任務係依制定的「華北經濟開發指導方策大綱」作重點部門的調查與立案開發計畫。至

<sup>34</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資料課編，《昭和10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東京：龍溪書舍，1979年），頁224。

<sup>35</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90。

於丙囑託班則由「經調會」第四部南鄉隆音（班長）等6人組成。他們主要在立案有關華北的金融、財政、貿易、經濟等各方面的緊急對策。除此之外，「滿洲國」也派遣由20名組成的甲囑託班，從事華北經濟產業開發以及有關統制各方面的研究調查。由於乙、丙囑託班大批人馬派赴天津，因此將原來的「天津駐在員事務所」升格為總裁室直屬的「天津事務所」（1935年11月）。他們的調查活動累積了不少有關華北的調查資料。<sup>⑳</sup>

第三期1936.1-1936.9，此期的立案計畫甚為短暫，卻完成「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以下簡稱「永年計畫」），<sup>㉑</sup>對日後滿鐵調查機關的調查活動影響很大。它是因受「滿洲國」所提「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畫」構想而觸發其企畫的。該計畫自1936年4月間開始籌畫，5月中旬完成大綱草案，至8月間全案出爐。<sup>㉒</sup>一般的說法認為「永年計畫」是「經調會」應關東軍要求而立案，然後加以擴大或修正後變成「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畫」的，<sup>㉓</sup>然而據實際參與企畫的三輪武認為「永年計畫」是出自「經調會」自主的構想。<sup>㉔</sup>

「經調會」完成的「永年計畫」方針係由企業對策、農業對策、移民對策、產業開發、資金計畫等五章構成，若從內容上加以推敲，在企畫立案時，其基本理念未必與關東軍相同。例如「經調會」的立案方針為「充實國防與調和經濟，也就是以擴充廣義的國防為目標，因此須檢討第一期建設的成果後，一面將矛盾加以調整，一面循必然發展的線上視現狀來建立可行之方案」。

⑳ 調查成果收錄於支那駐屯軍司令部乙囑託班總務班編，《乙囑託班調查概要》，北支・業務調查書類第一編第一卷（天津，1937年）。井村哲郎，〈北支經濟調查班報告書目錄〉，《アジア經濟資料月報》，卷19，號10（1977年10月）。見三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71-72。

㉑ 「永年計畫」最初企畫時名為「滿洲經濟の長期的な均衡たる發展のための基本的な條件の研究」（中譯為「滿洲經濟長期均衡發展的基本條件研究」）為大上末廣等人所定，然在3月間的協商會上，有人認為題目過長，經商議才正式決定取名為「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三輪武，〈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查會〉（I），頁60、62。

㉒ 「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畫」係指1937年以後五年間的開發計畫。至於「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的企畫經過，見三輪武，〈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查會〉（I），頁56-70。

㉓ 原朗，〈1930年代の滿洲經濟統制政策〉，滿鐵史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の滿洲——「滿洲國」成立後の經濟研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2年），頁61。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壊〉（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5年），頁67。

㉔ 三輪武，〈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查會〉，頁56。

在方法論本身而言，兩者雖一致，然關東軍係以國防第一，資源的戰時動員為主要目標。又如在建設的實施上，兩者所持立場也不同，關東軍認為應以軍用資源的就地調度為前提，而「經調會」則主張日本政府及民間資本直接入侵的積極化與動員「滿洲」國內的資本為急務。在產業的計畫上，兩者的立場也不同，關東軍把礦工業作為重心，「經調會」則主張綜合的開發。例如在一次協調會上，關東軍第三課參謀秋永月三對於業務計畫曾質詢稱：「有關農業方面極為詳盡，但對於礦工業的處理太過於輕率……對礦工業不知作何想法」，「經調會」則明確回答：「我們的意圖並不在於部分的開發，而是綜合的開發，在這情形下是以農業為中心」。<sup>④</sup>

「經調會」所以把重點放在農業，也許是依據他們經過相當長的歲月觀察到東北農民的貧困，加上1930年代以來的經濟恐慌，使農民的貧困更加惡化，破產事件層出不窮而來，而最重要的還是由於東北的自然生態是絕對的農業社會。<sup>②</sup>而實際參與「永年計畫」立案者除大上末廣外，尚有酒家彥太郎、南鄉隆音、平貞藏、本多重雄、和田耕作、佐佐木義武、山中四郎、稻葉四郎等，他們都是受過經濟學理論教育的「經調會」的俊彥。<sup>③</sup>基於此點，關東軍與「經調會」之間在理念上所以會產生差異，是很自然的事。

「經調會」自1932年1月成立至1936年10月因滿鐵修訂編制成立產業部而解散，在這四年又八個月期間，因企畫「滿洲國」經濟建設的藍圖，動員了九百多位調查人員的智慧，從事各種立案及調查工作，經他們手中完成的調查立案及資料件數，合計達到1,882件之多，其中與立案有關者829件，調查資料1,053件。調查地區涵蓋了東北全境及內蒙、華北、蘇俄遠東區，內容則包羅萬象，大致可歸納為(1)立案調查關係書類，(2)資源調查關係書類，(3)經調資料，(4)定期與不定期刊物等四個類別。就整體而言，成果是很豐碩的。<sup>④</sup>

① 經濟調查會，《滿洲永年計畫資料》（1937年），頁61-77。引自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119、122。三輪武，〈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查會〉（I），頁74。

② 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121。

③ 三輪武，〈滿洲產業開發永年計畫案と經濟調查會〉（I），頁60。

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90-2395。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126。

## (二) 低迷狀態的產業部 (1936.10-1938.3)

### 1. 任務

1936年10月1日，滿鐵改編組織成立產業部，「經調會」因而裁撤，其業務歸併產業部。我們都知道，滿鐵調查機關的基本精神是在配合日本國策，其所負的任務美其名為促進東北產業的開發與經濟的發展，實則提供日本政府有關滿蒙的調查資料或情報，達到侵華的目的。產業部的設立只是換湯不換藥，實質任務是大同小異的。

產業部設立的目的，可從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對滿鐵社員的訓諭中看出。他說：「會社（滿鐵）的最大國策使命是在促進東北的產業發展與經濟開發，鐵路的經營，在國防上不僅具有直接意義，而且也是完成國策使命的重要手段，再者，完成這個使命，也就等於加強國防基礎。基於此一趣旨創設本部，與『滿洲國』同心協力，保持密切連繫，鐵路的營運與兩者互相結合，全力達成公司的使命」。<sup>④⑤</sup>

1936年10月，松岡在第一次滿鐵產業會議上，具體地指出「滿鐵的主要使命在於順應『日滿』兩國國策，協助滿蒙的經濟開發，『滿洲國』與滿鐵各盡其功能而活動，其終極目標則是完成遠大而崇高的大陸政策，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接著他又說「現在日本的國民經濟，已逐漸在強而有力的國家意志統制之下，滿洲經濟也與之配合，已進入作廣泛而積極地綜合計畫的產業開發時期，在此重要時期，新設置的產業部應與關東軍、『滿洲國』好好合作，以期達成滿鐵所擔負的使命」。<sup>④⑥</sup>

松岡的上述訓諭，很明確地說明了滿鐵與「滿洲國」的關係；認為產業部不僅要對「滿洲國」的產業開發及經濟發展盡應盡的義務，甚至還要盡到開拓者的任務，擔任東北第二期建設的重責大任，為邁向戰時體制中所謂「綜合的計畫的產業開發」目標的一部分任務。換言之，松岡有意以滿鐵全力協助日本軍部，而其調查研究機關的改組也是配合「滿洲國」的產業開發而來。<sup>④⑦</sup>

<sup>④⑤</sup> 松岡洋右傳記刊行會編，《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東京：講談社，1974年），頁662。

<sup>④⑥</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97。

<sup>④⑦</sup> 松岡洋右，《滿鐵を語る》（東京：第一出版社，昭和12年），頁271。《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65。

「滿洲國」既已建立，產業部的首要任務當然放在「滿洲國」的產業研究調查與開發，其次為協助對華的經濟與產業開發。在東北而言，他們認為「滿洲國」是事實的存在，已與日本成為不可分的一體，滿鐵無意將產業開發與經濟發展事宜一手包辦，滿鐵當局認為產業部的任務在於輔佐年輕的「滿洲國」的成長，或與它合作共同致力於滿蒙的產業開發與經濟發展。滿鐵更認為可以用其豐富的經驗及技能，就「滿洲國」無法完成的部分協助其完成，最終目標在於建立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進而強化日本國防上的第一線基礎。<sup>④</sup> 由此可知，當時滿鐵的態度已有由主導東北經濟建設者的身份，轉為協助者地位的趨勢，至於產業部更以配角身份盡一份心力而已。

其實，在「經調會」時企畫的「永年計畫」案等所累積的經驗，產業部並沒有加以持續，而「五年計畫」中的早期資金計畫案，亦受到大藏省強烈的反對而被削減，產業部的調查研究任務，處處受到掣肘。<sup>⑤</sup> 1937年12月以民間資本而設立的「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業」），承攬了東北的鐵礦、煤炭、礦業、鋼鐵業、輕金屬礦業、汽車製造業、航空機械製造等重工業開發事宜，<sup>⑥</sup> 由於「滿業」的設立，產業部將一部分有關重工業的幾個研究機關割愛給「滿業」，同時構成產業部的中心幹部也紛紛轉調「滿業」。產業部因此形同空殼，其業務計畫案也如同畫餅，<sup>⑦</sup> 成果不彰是不難想像的。

自1936年以後滿鐵的調查目標，已逐漸轉向華北，一方面因為華北的情勢日益緊張，日本軍部有鑑於對華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滿鐵協助的意向日益強烈，另一方面日本軍部也有意將滿鐵的注意力導向華北，藉此緩和滿鐵對軍部不滿的情緒，<sup>⑧</sup> 然而華北的調查研究活動，幾乎被北支事務局（1937年8月27日由天津事務所改組而成）所取代，而一般的產業開發事宜，則由直屬滿鐵的興中公司（1935.8設立）<sup>⑨</sup> 包辦，所以產業部本身在華北也很難發揮功能。

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97。《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64-665。

⑤ 三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75。

⑥ 同上文，頁75。滿鐵會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四次十年史〉（東京：龍溪書舍，昭和61年），頁49。

⑦ 三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72-73、75。

⑧ 滿鐵的反軍情緒，係由1932-1933年的滿鐵改組問題引起。

⑨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昭和39年），頁787。《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43-644。



前面已經提到產業部設置的目的及其任務，在於從事東北經濟開發的基礎調查並助長產業開發；顧名思義，它是東北產業開發的綜合企畫機構，舉凡一般經濟、各種產業交通、金融、一般法政、勞動、殖民等均歸其掌理。<sup>⑤④</sup>然而由於上述客觀條件，使產業部一直處於低迷狀態，又由於其權限一再縮小，所以被戲稱為「縮小調查機關」。1938年4月，設置調查部，產業部因而解體，歷時僅一年六個月。

## 2. 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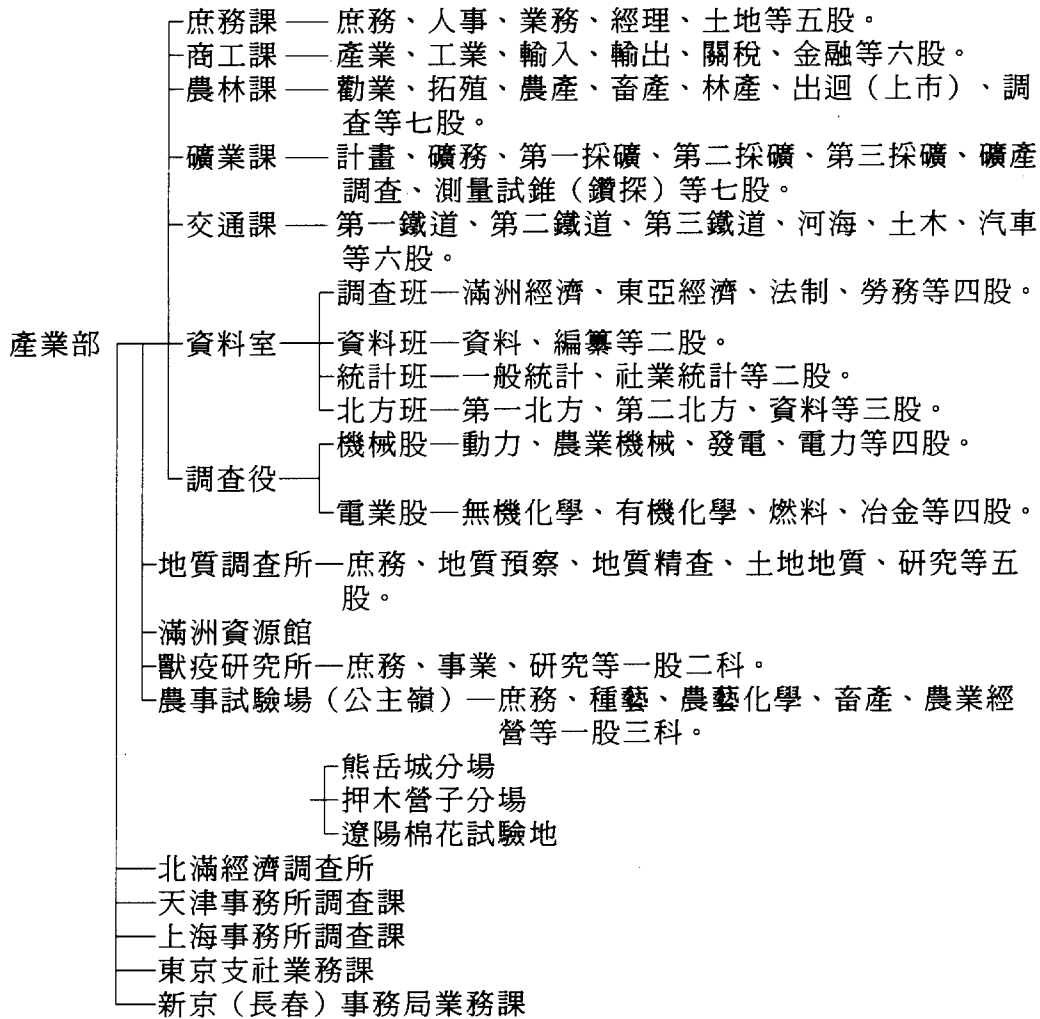
滿鐵自創設以來，設置的調查機關既複雜又龐大，大致上可歸納為(1)一般的經濟調查機關，(2)自然科學的研究機關兩大類型。如調查部(1907.4設立，1908.12改稱調查課)、東亞經濟調查局(1908.9)、哈爾濱事務所調查課(1923.4)、經濟調查會(1932.1)、哈爾濱經濟調查所(1935.3設於哈爾濱鐵路局內)、天津事務所調查課(1935.11)、上海事務所調查課(1936.10)、產業部(1936.10)等皆屬一般經濟調查機關，至於主要的自然科學研究機關有中央試驗所(1907)、地質調查所(1919)、農事試驗場(1918)、獸疫研究所(1925.10)、衛生研究所(1926.1)、滿洲資源館(1932.12)等，這些調查研究機關雖屬滿鐵，但似乎各自為政，形成各自獨立的機構。1936年10月，滿鐵修改組織規程，以經濟調查會、計畫部及各地區有關產業部門為基礎成立產業部，並將地質調查所、滿洲資源館、獸疫研究所、農事試驗場等自然科學研究機關納入產業部管轄之下，至於中央試驗所則直屬總裁室。<sup>⑤⑤</sup>滿鐵當局實有意由產業部統制滿鐵各產業機關，使其一元化。

產業部成立之初，就是一種複合的組織，因此，其編制與過去有所不同，是將產業部門的類別加以編成，其編制如下表：

<sup>⑤④</sup> 滿鐵產業部編，《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東京：龍溪書舍，1979年），頁4。

<sup>⑤⑤</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三十年略史》（東京：原書房，1981年），頁594-595。

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



資料來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 2396。《昭和 11 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 5。

産業部的組織在表面上看來似乎龐大，然而從事基礎調查的一般經濟調查機關如北滿、天津、上海、東京、長春等調查單位（請參閱上表）實質上形同獨立，産業部對他們的統轄有無力之感（上列調查機關將於後面開闢專章討論）。至於産業部本身的調查重鎮在資料室，因為資料室是合併「經調會」

的第一部（東北、東亞一般經濟調查研究及社業、商業、交通、及其他統計製作）、第五部（諸稅、外事、法制、勞動、殖民）及舊總務部資料課的一部分單位而成的。資料室是以社業資料的出版、蒐集與保管，有關社業的統計製作，從事滿、華、蒙、俄等地的一般基礎調查，對產業部所屬各課的調查功能，提供基礎的資料為主要任務，因此產業部總部從事一般經濟調查研究的調查人員幾乎都配置在資料室的調查班與資料班。<sup>56</sup>

提到滿鐵的調查研究機關，通常都以一般的經濟調查研究，亦即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調查有關的機關為代表，往往忽略了自然科學研究的機關，其實這些機關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以下擬簡單介紹產業部所屬自然科學研究機關的沿革及其業務。

**地質調查所** 1907年4月設立，初名地質課，隸屬礦業部，1910年4月正式改稱地質調查所，其隸屬主管單位屢有改變，至1936年10月，歸產業部主管。該研究所的業務係從事東北礦物資源的預察調查、礦產地調查及一般地質的調查研究，舉凡各種有用礦物的探勘、礦產地的調查及其價值之研究、工業原料、建築石材的調查、鐵路及道路沿線之一般調查、治水利用必要之土木地質調查，其他如地下水、溫泉地盤之調查等皆為該研究所的業務範圍。<sup>57</sup>

**滿洲資源館** 1926年3月籌設，同年10月正式開放供民眾參觀。設立之初名為滿蒙物資參考館，1928年11月改稱滿蒙資源館，1932年12月才改稱滿洲資源館。該館係以蒐集與東北的資源及產業有關的現品、標本、參考資料以陳列展示的方式作為利用開發的指針，提升產業的振興與推廣社業時的參考，並增進一般民眾的科學知識為目的而設立。展示的內容及件數大概是這樣的：(1)礦產關係6,365件，(2)農產關係3,871件，(3)畜產關係466件，(4)水產關係272件，(5)風俗及參考品關係12,758件。該館為東北唯一的資源陳列館，滿鐵當局甚至日本政府相當重視。<sup>58</sup>

<sup>56</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4、頁117。

<sup>57</sup> 同上書，頁133。至於地質研究所的調查研究成果，請參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540。

<sup>58</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541-2543。

**獸疫研究所** 1925年10月設立，初隸屬興業部，1930年6月改屬殖產部，1931年8月歸地方部主管，1936年10月產業部成立，該研究所改歸該部主管。該研究所的業務包括血清類的製造配給、檢定、應用上的指導，家畜疾病的研究調查、預防、治療、消毒之研究，舉辦家畜疾病的講習等。<sup>⑤</sup>

### 農事試驗場

(1)公主嶺本場 創設於1913年，初名產業試驗場，1918年1月改稱農事試驗場。該試驗場設種藝、農藝化學、畜產、農業經營等科，分別從事各種食用作物、油料作物、糠料作物等品種改良及栽培法的研究；土壤、肥料、灌溉水、農畜產物的加工及飼料等有關的理化學的調查研究；家畜的品種改良及振興畜產有關的實驗；研究滿族農民及日本移民的農業經營型態並加以指導改善等。

(2)熊岳城分場 1909年在熊岳城開設苗圃，1913年公主嶺產業試驗場開設時成為產業試驗場熊岳城分場。1918年改稱農事試驗場熊岳城分場。該分場設園藝、種藝、養蠶、林產、病理昆蟲（1938年10月由公主嶺本場移管）等五分科，分別從事蔬菜、果樹、花卉、儲藏加工的試驗；水稻、田地作物、野蠶、桑樹、造林、木材利用、林業、昆蟲及昆蟲病理等的試驗或研究調查。

(3)押木營子分場 1913年創設公主嶺產業試驗場時，即設畜產科進行滿蒙地區有關家畜改良的各種試驗，由於受到牧地限制，滿鐵於1919年編列設置產馬試驗場預算，因當時東北政情無法取得用地。及至1927年與大鄭線白市附近住民締結牝馬預托契約，收容蒙古種牝馬200匹，才開始從事試驗工作。後因九一八事變，工作中斷，而「滿洲國」成立後頒布馬政局組織，滿鐵僅擔任馬匹改良的試驗工作。至於牛方面，於1929年在「奈曼旗大倉組農場」購入蒙古種牝牛及短角種，開始蒙古牛的改良試驗工作，此項工作亦因九一八事變中斷，及至東北情勢穩定，「滿洲國」無償提供押木營子附近地段，於1934年1月以「札薩克固牛馬試驗地」之臨時名稱，將臨時收容所的試驗動物移管至此，1936年4月部分辦公室及畜舍完成，並正式取名為押木營子分場。該分場

<sup>⑤</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140-154。

設置馬匹改良、畜牛改良等股，從事於「滿洲國」在牛馬改良上的根本問題、有關飼料作物栽培、植樹、牛馬衛生、疾病等的試驗與調查。

(4)遼陽棉花試驗地 1928年在遼陽設置棉花試作場，開始試驗有關棉花的栽培方法，至1936年正式設置棉花試驗地，隸屬於公主嶺農事試驗場。分設育種、栽培試驗兩股，分別從事優良品種培養之試驗及栽培改良的研究與氣象的觀測等。<sup>⑩</sup>

**中央試驗所** 中央試驗所雖然不隸屬於產業部，但是它的設置很早，組織龐大，調查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是滿鐵理化學工業試驗及研究的重鎮。有關滿鐵調查機關的論著中，多分析經濟調查機關，少涉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機關。<sup>⑪</sup> 蓋從事一般經濟調查的人員較自然科學的研究人員活躍，而撰寫回憶錄等文章者屬前者為多。後者多默默為自己的工作及使命而努力，似不太炫耀自己的成果。中央試驗所既是滿鐵調查機關的一環，擬在此介紹其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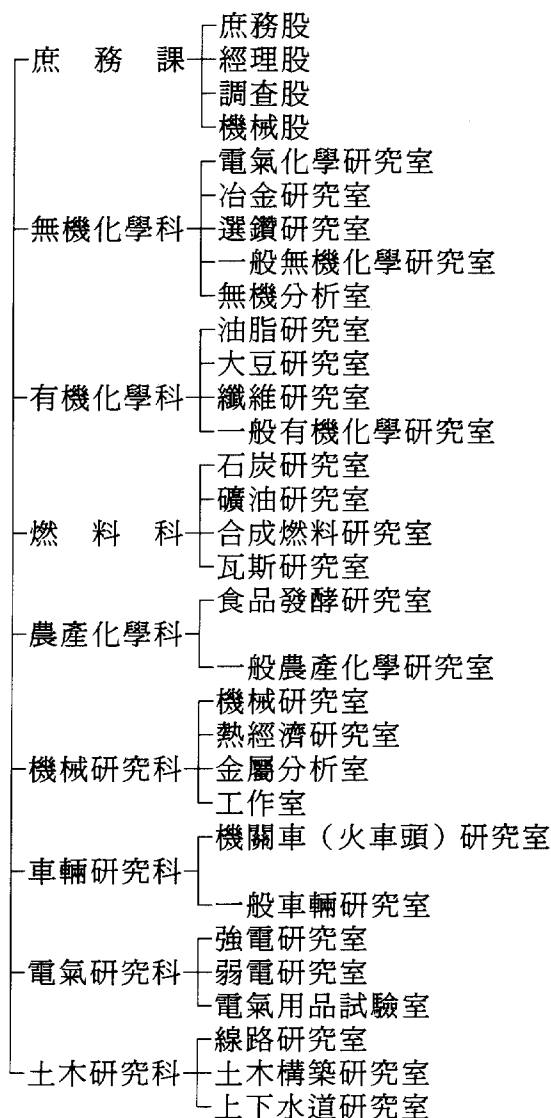
中央試驗所創立於1907年10月12日，初隸屬關東都督府，從事有關殖產工業及衛生的鑑定與試驗等事宜。1910年5月1日由滿鐵接管，直屬總裁室（1910.5-1914.5），以後先後屬總務部（1914.5-1918.9）、地方部（1918.9-1922.1）、興業部（1922.1-1930.6）、殖產部（1930.6-1931.8）、技術局（1931.8-1932.12）、計畫部（1932.12-1936.9），至1936年9月以後又回歸總裁室直屬（惟1938至1941年之間，曾一度歸屬調查部）。其組織時有變動，1936年9月的組織是這樣的：<sup>⑫</sup>

---

⑩ 有關農事試驗場部分均參閱上書，頁141-154。

⑪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456-2457。

⑫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201。



從上表可看出其規模是很大的；就以 1936 年為例，工作人員有四百餘人，上半年度的經費為四十七餘萬圓。<sup>63</sup> 之後其規模一再擴大，不斷吸收新進人員，至二次大戰結束前夕，人員達一千人以上，經費每年約一千萬圓，其規模

<sup>63</sup> 同上書，頁 204-205。

實可以媲美 1939 年成立的「大調查部」而成長為另一個大規模的研究機關。<sup>④</sup>

中央試驗所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把重點從過去特產物的利用研究轉移至液體燃料及輕金屬的研究上，由這一點可以看出，該試驗所也配合時局的變化積極推動具有濃厚軍事色彩的研究。<sup>⑤</sup>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試驗所在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簡稱「滿業」）的資金援助下，作各種研究，這不僅是基於「滿業」傘下的事業，原為滿鐵所開發，是一種技術上的連帶關係，同時也是出於「滿業」總裁鮎川義介的強烈企圖心。鮎川認為中央試驗所的使命原本就在於東北的資源開發研究，並不一定僅須對滿鐵效勞，這種委託研究的權宜主義，更顯現出滿鐵在當時國家獨占資本主義下所處的地位。換句話說，雖然「滿鐵王國」的功能已大不如前，但它仍不失為與民間資本（對滿投資）、「滿業」（軍需重工業的開發），成為開發東北甚至形成日本在戰時國家獨占資本主義的三大支柱。<sup>⑥</sup>

### （三）重振調查功能的調查部（1938.4-1943.5）

#### 1. 松岡洋右的心結

1932-1933 年之間，因「滿鐵改組」問題所引起的滿鐵員工不滿情緒尚未平息之際，松岡洋右於 1935 年 8 月就任第十三任滿鐵總裁（1935.8-1939.3）。而且此時期正是軍部積極干預滿鐵業務之時，故松岡尚未正式就任之前，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林銑十郎在一次懇談中，向松岡提出以下幾點要求：

（1）要求滿鐵應與關東軍協調；認為自九一八事變後兩者原來緊密的一體化已鬆懈，尤其因 1933 年的「滿鐵改組」問題，兩者已傷和氣，對關東軍批判之聲不僅止於社員，亦見於股東或社友，希望改正這種空氣，確立圓滿的協調體制。

（2）由於「滿洲國」的成立，滿鐵本身應縮小政治活動空間，專事於經濟活

<sup>④</sup> 佐藤正典，《一科學者の回想》（私家版，1971年），頁 115-118、125-130。引自岡部牧夫，〈日本帝國主義と滿鐵——十五年戰爭期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195（1978年 11月），頁 82。按佐藤正典對油脂的研究造詣很深，曾獲日本國內及歐美各國的多種專利。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 2463-2468。

<sup>⑤</sup> 岡部牧夫，前引論文，頁 82。

<sup>⑥</sup> 同上書，頁 82、86。

動，尤應以交通事業為重心，也就是說希望將重工業部門從滿鐵分離，並調整甚至讓出附屬地的行政權。

(3)為了「日滿支」經濟合作，滿鐵應促成興中公司早日成立（1935.8.2奉准設立，1941.10.31解散）。

(4)滿鐵應以超然態度完成使命，不應被日本國內的政情所左右。<sup>⑥7</sup>  
從上述懇談中可知，軍部限制滿鐵活動的意圖，已到表面化與具體化。

松岡曾三次出任滿鐵要職（第一次任理事1921-1925，第二次任副總裁1927-1929，第三次為總裁1935-1939。按滿鐵要員中，曾歷任理事、副總裁、總裁者，僅松岡與末代總裁山崎元幹兩人而已），因此對滿鐵的情形知之甚詳。滿鐵事業之日漸受挫，滿鐵內部尤其調查機關低迷的氣氛，他並不是不知道，因此，1935年8月就任時，就決定立即進行各機關的革新，藉此一掃因滿鐵改組問題帶來的陰霾，然而他也認為須視實際情況進行研究，廣徵意見，並以時間來解決這些問題。他還說這一年以來，他已廣泛地聽取各方意見。<sup>⑥8</sup>這一段話不僅充分表示松岡有重振滿鐵聲譽的決心，而且在字裏行間也多少表露了他內心的苦悶。

其實，松岡在總裁任內可以說是多事之秋，日本政府為導入民間資本至東北並配合戰時體制，相繼設立許多機構，滿鐵的功能無形中受到牽制，所以松岡的苦惱是深刻的；例如「滿業」的設立（1937.12），滿鐵割愛不少事業與人材給「滿業」，<sup>⑥9</sup>又如日本政府也先後設立「企畫院」（1937.10）與「興亞院」（1938.12），分別統轄物資總動員計畫之立案與對中國的經營政策等事宜，<sup>⑦0</sup>說明了滿鐵的活動空間逐漸被侵蝕，而新設立的調查部因繼承了產

⑥7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1》，頁785-787。《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28-629。

⑥8 《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64。

⑥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四次十年史》，頁48-49。

⑦0 興亞院設立於1938年，為內閣直屬機關，總裁為首相，副總裁由外務、大藏、陸軍、海軍等四大臣擔任，任務為統轄中國政策（外交除外）及占領地之行政權，1942年被大東亞省合併。企畫院設立於1937年10月，任務以物資總動員計畫之立案及強化經濟統制為主，1943年被軍需省合併。見高柳光壽等編，《角川日本史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91年），頁242、328。



業部的低迷狀態，既無積極的目標與任務，也無整體的調查研究計畫，整個調查部顯得意氣消沉，甚至部內有人擔心調查部會因此而解體，一種危機感瀰漫著調查部，也有人預料「滿鐵王國」的聲譽，也許將在松岡總裁時代譜上休止符。

上述情勢，當然引起滿鐵社員的不滿，而此次的不滿情緒與過往「滿鐵改組」時社員一致針對軍部的情形不同，其不滿情緒已擴大到滿鐵的高層幹部，甚至出現要滿鐵高層幹部（包括總裁）總辭的言論，雖然松岡在就職之際曾保證絕不會讓滿鐵陷於「七零八落」，而社員卻認為「如同聽了天聲人語」，由此可知1937年至1938年之間的情勢，確使滿鐵社員喪失了自信。<sup>①</sup>

身為滿鐵總裁的松岡洋右，當然不會不審視當時情勢與罔顧社員不滿情緒，為了滿鐵的「延命策」，松岡自1937年初冬起，即「日以繼夜絞盡腦汁」去思考，終於獲得一個結論，那就是「調查部的擴充強化與煤炭液化事業」。前者將於下一節詳述，為了使煤炭液化事業走上軌道，曾聘請有日本科學界國寶之稱的丸澤常哉主持研究工作，其下配置阿部良之助等輔佐。<sup>②</sup>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調查部組織的整頓與強化，與其說是因滿鐵的相關事業受到挫折而觸發的窮極之策，還不如說是松岡多年來的構想。因為1936年5月，松岡在滿鐵諜報調查業務商談會的致詞中即已表示：「我在十幾年前來滿鐵無論如何要把公司的諜報工作做好，因為當時大家幾乎都把諜報工作給忽略」。<sup>③</sup>松岡的用詞雖然是諜報，惟當時松岡的腦海中，似乎認為諜報與調查是沒有區別。上面一段致詞可以說明滿鐵的鈍挫，是使松岡決心將多年來的構想加以具體化的契機。<sup>④</sup>

戰後很多研究論著均認為，松岡是承繼後藤新平的衣鉢致力於調查機關的擴充強化及人材的培養，使後期的「大調查部」（1939年4月1日改組、擴充後的調查部，俗稱「大調查部」）大放異彩的功臣，我們不否認調查部的重

①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304。

② 同上書，頁305。《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697-698。

③ 《松岡洋右——その人と生涯》，頁139。

④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東京：亞紀書房，1982年），頁4-5。

建是在松岡手中實現，然而此應得助於一批關心調查部的前途並提出具體計畫默默積極推動的幕後英雄。

## 2. 調查部的改組、擴充

(1)經過 上一節已分析過，自1935年以後滿鐵調查機關內瀰漫著挫折感，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如果這種低迷、沉滯的狀態再持續下去，滿鐵的調查組織有崩潰的可能。然而有一批調查部的中堅分子卻認為就因為處於這種時期，更應該對東北甚至於中國的社會作基礎的調查，以恢復昔日滿鐵調查機關的創立精神，而且所有調查機關之間必須作緊密的連繫，同心協力結合在一起，為掃除低迷、沉滯而努力，這樣才是調查部達成對時局的因應之策。他們想要繼承在「經調會」時期，一部分調查人員之間在滿鐵的調查活動過程中所萌芽的調查方法與理念加以發展（應指大上末廣等講求理論、方法論的講座派人士），而居中推動最力的是三輪武。<sup>⑮</sup>

三輪武於1938年8月，由天津事務所調至上海事務所，到任後，他向所長伊藤武雄提出上海事務所擴充計畫案，認為應將上海事務所作為涵蓋「日滿支」的滿鐵調查組織的一環加以擴充營運，得到伊藤的首肯，仍派三輪前往大連（伊藤無法分身），試探總社意向與志同者共商相關事宜。

1938年9月三輪到大連，隨即與調查部庶務課業務股主任松岡瑞雄商議有關調查重振的目標、調查課題、組織與營運等問題，並決定向有關方面提出構想。當時實際負責調查部業務的是調查部次長宮本通治，而宮本聽取三輪等有關上海事務所調查的擴充及整個調查部的擴充整頓報告後表示，上海事務所問題是總裁室所管，非調查部的管轄，如認為必要，上海事務所可逕自與總裁室文書課連絡，獨自實行即可，至於調查部，則沒有考慮過擴充等問題，也沒有要作的意向，正面就給三輪等潑了冷水。三輪等並不因此而氣餒，乃與松岡瑞雄分別向滿鐵的其他幹部活動，其間獲得中島宗一（總裁室參與）、高田精作（文書課長）、鹽川荒雄（文書課員，主管調查部相關業務）等的贊同與協助，最後並得到宮本的首肯，答應於11月上旬在奉天召開的滿鐵理事會議

<sup>⑮</sup> 同上書，頁5。

中正式提出。1938年11月8日滿鐵理事會議在奉天召開，滿鐵調查部的擴充案也正式列入議程，會中理事對於擴充案並無任何質疑與意見，松岡洋右於是打破沉默，突然詢問鄰座的副總裁佐佐木謙一郎，經費有無著落，<sup>⑭</sup> 佐佐木答稱，如確有必要，這一筆經費沒有問題，松岡總裁隨即宣佈照原案通過。<sup>⑮</sup>

「大調查部」的成立，可以說是松岡總裁多年來的構想的實現，也是他撫平滿鐵內部不滿情緒的苦肉之策。松岡的構想是想將「大調查部」成為在大陸涵蓋政治、經濟、軍事三者的參謀本部。<sup>⑯</sup> 他的構想與1933年「滿鐵改組」問題時，沼田中佐所提示的第三項「由滿鐵經濟調查會與特務部合作成立的經濟參謀本部」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松岡重新加以整理而已。<sup>⑰</sup> 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大調查部」的成立，與1932年成立的經濟調查會是不同的；「大調查部」的成立並沒有受到政府機關或來自軍部的壓力，而是由滿鐵內部一批中堅分子搭乘了松岡洋右多年的構想的便車，互相結合而實現的。這件事情對擴充後的調查部的營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當時日本的輿論對改組、擴充後的調查部均寄以厚望，認為「大調查部」也許可以在日本制定大陸政策上充分扮演智囊的角色，貢獻所有的力量。<sup>⑱</sup>

另一方面滿鐵內部也呈現一片雄心萬丈的氣象；認為以蘆溝橋事變為契機，趁日本推動大陸政策的機會，可將不屈不撓的開拓精神再度燃起。如果從滿鐵三十年來的歷史觀點來看，「大調查部」既不是「經調會」的恢復，當然也不是產業部的再現。它將伴隨著日本大陸政策畫時代的發展進入新的時代，也將擔荷獨自開拓新領域的使命。<sup>⑲</sup> 這一段敘述，雖然充滿了侵略主義的

<sup>⑭</sup> 1938年11月7日理事會召開的前一天，三輪武在奉天ヤマト（大和）旅社巧遇松岡總裁，提到擴充後所需經費時，三輪答以初年度調查部需500萬圓，中央試驗所250萬圓共750萬圓，到第五年時約需1,000萬圓。見三輪武，〈經濟調查會から調査部まで〉（I），頁79。

<sup>⑮</sup> 三輪武，松岡瑞雄等推動調查部擴充案的經過，請參閱三輪武上文，頁75-80。上海滿鐵會編，《長江の流れと共に——上海滿鐵回想錄》（東京：同編者，昭和55年），頁22-24。

<sup>⑯</sup> 滿鐵弘報課編，《滿鐵と調査》，1940年度，頁49。

<sup>⑰</sup>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85。

<sup>⑱</sup> 《滿鐵調査部綜合調査報告集》，頁189。

<sup>⑲</sup> 滿鐵弘報課編，《滿鐵と調査》，1940年度，頁48。

色彩，但對調查部的人員來說，實有雨過天青，從今可大顯身手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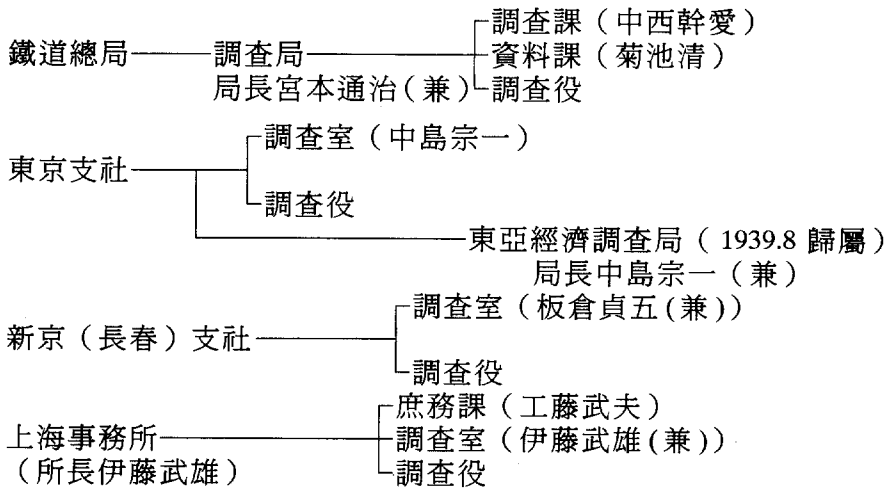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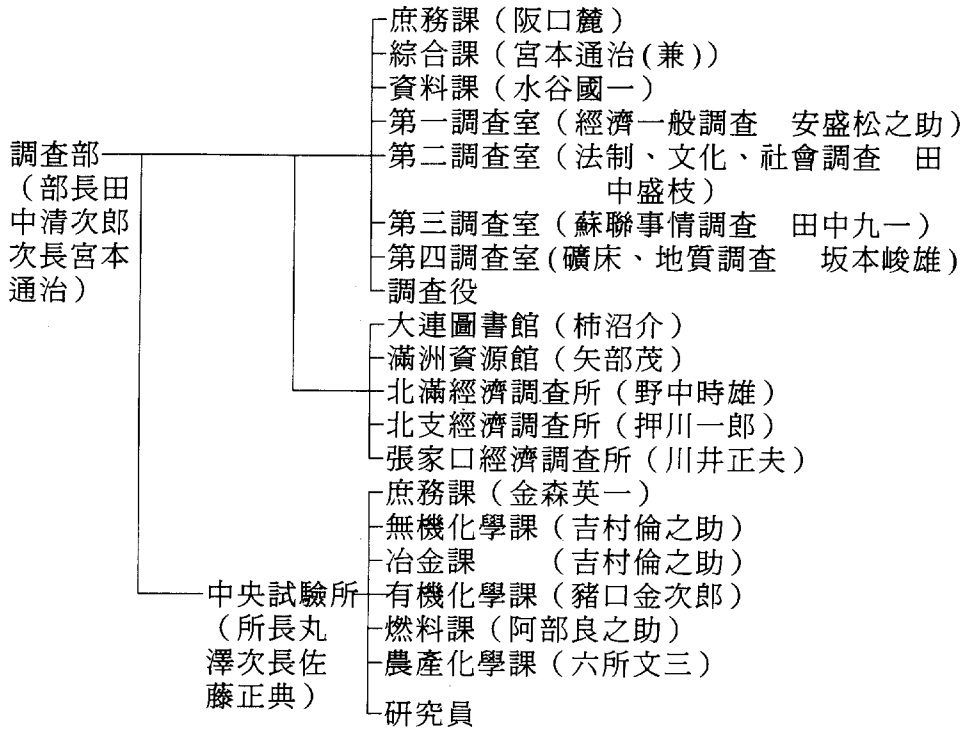
「大調查部」成立後，松岡即拔擢後藤新平時代的年輕首任理事田中清次郎（出身三井物產）出任調查部長，並給予相當於副總裁的待遇，松岡所以如此禮遇田中，無非想提高「大調查部」的地位，也因為田中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他的理念可以反映在調查業務的執行上，給沉滯已久的調查機關帶來朝氣，而田中也的確得到「大調查部」內同仁的普遍信賴。

由編制上看，改組、擴充後的調查部是很龐大的，而且其調查的對象涵蓋了整個東亞地區，它在滿鐵調查機關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上面已經提過，「大調查部」的催生工作是由一批中堅調查人員進行，而憑著松岡的果斷，在其手中開花結果，所以一般認為「大調查部」是松岡洋右送給滿鐵的臨別禮物（1938.11.9通過改組、擴充，1939.4.1實施，1939.3.24松岡卸總裁職，1939.7.22轉任外務大臣），而且這個禮物留給滿鐵調查人員的意義是很深遠的。

(2)組織 滿鐵當局依據1938年11月理事會議的決議，於1939年4月1日正式將調查部改組、擴充，情形大致如下：

一向由大連總社調查機關主管的北滿經濟調查所（哈爾濱）、滿洲資源館（大連）依然歸屬總社調查部管轄，同時將調查部內部機構由從前的二課（庶務、資料）、一調查役，擴充為三課（庶務、綜合、資料）、四調查室、一調查役。在東京及新京（長春）兩支社增設調查室。將上海事務所的調查課及鐵道總局（奉天）的資料課分別改組、擴充為調查室及調查局，並將這些單位的調查活動置於調查部管理之下。又將北支事務局（北京）的調查部改組為北支經濟調查所（北京）與張家口經濟調查所（張家口），成為直屬單位。值得一提的是，自1929年以來脫離滿鐵而獨立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東京），於1939年8月復歸滿鐵，成為東京支社的直屬單位。另外在東北地區以研究資源的實用化而聞名的理化學工業試驗及研究重鎮的中央試驗所（大連），亦於此次改組成為調查部的直屬單位（1941年再度直屬總裁室）。依據以上的說明，畫成組織表及其主管如下（1939年4月1日）。<sup>②</sup>

<sup>②</sup> 《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7-9。



資料來源：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査部綜合調査報告》，頁8～9。

如同上表所顯示，擴大改編後最大的特點是，將過去滿鐵各方面的調查功能納入調查部傘下使之統一化，不僅是有關社會科學的調查，連自然科學相關的調查功能也加以一體化。其次，過去滿鐵所屬的很多調查機關，因業務性質不同而分屬於不同單位，例如與交通相關的調查機關除屬鐵道總局外，其支社或駐外的調查單位或屬於總務部或直屬總裁室，隸屬關係頗為複雜。由於這次的改編，所有調查單位加以統合於調查部，至於各調查機關的調查業務，則視性質不同作有機的運作。

從上表可以看出改編後的滿鐵調查機關，在長江流域以北的各重要地方，都置有調查據點，而且調查的重心有南移的趨勢，這是配合日本對華軍事行動所作的策略，另外，東京支社及東亞經濟調查局則偏重於東南亞方面的調查。由此可知滿鐵的調查網涵蓋東亞地區，如同滿鐵調查部改組、擴充的主旨中所說，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全東亞的日本的政策，要以整個東亞的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真正的科學的綜合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才不會有錯誤，因為這種研究目前還沒有明顯頭緒，改組後的調查部身負其責，期以在部制定大陸政策上，能夠提供正確而客觀的調查研究。<sup>③</sup>

所謂客觀的調查研究就是指真正的科學的綜合研究，顯示此次滿鐵調查的改組、擴充有兩種意義：一為配合日本政府的大陸政策，二為反映滿鐵調查機關內中堅調查人員的主張。

1939年4月「大調查部」成立之初，實際人員（含職員、雇員、傭員）有1,731人，1940年4月時有2,345人，一年之間增加六百多人，1941年度由於滿鐵的財政比較吃緊，人員減至2,039人。1942年9月發生所謂「調查部檢肅事件」以後人員也逐漸減少，然而至1943年5月時，整個調查機關尚擁有1,278人。至於經費的預算方面，1939年度為978萬圓，1940年度為1,117萬圓，1941年度為957萬圓，1942年度為892萬圓，1943年度為800萬圓。1938年11月的理事會議時訂定改組五年後的調查部組織的經費規模為1,000萬圓，然而到第二年（1940年）其預算即已超過1,000萬圓。<sup>④</sup> 上列每年近1,000萬圓的預算，約

<sup>③</sup> 同上書，頁13-14。

<sup>④</sup> 同上書，頁9-13。

相當於 1970 年代的 50 ~ 60 億圓。<sup>⑤</sup>

組織如此龐大的「大調查部」幾乎每年都會修改職制，至 1943 年 5 月 1 日，又將調查部改制為調查局，同年 6 月發生第二次「檢肅事件」，關東軍以此為契機，將調查局本部強行移至新京（長春），雖然 1944 年 4 月再度遷回大連，但兩次檢肅事件以後，滿鐵調查機關的元氣大喪，調查研究的功能已走下坡，實已瀕臨瓦解狀態。

### 3. 基本任務與調查方針

「大調查部」的任務，在 1939 年 3 月 6 日總裁室總務課長函東京支社長作為在國會的說明資料中明示：(1) 滿鐵調查部並不是政策的實施者，而是在政策的樹立與運用上提供正確的基礎，與政策的實施機關保持密切的連繫，從事嚴正而客觀的調查研究，(2) 身負建設東亞交通、企業上擔任角色的滿鐵調查機關應與公司業務的企畫營運保持密切連繫，為達成建設東亞的過程中扮演交通、企業的指導使命而從事調查研究等兩點認知上，作真正的科學的綜合研究。<sup>⑥</sup> 可知其任務兼有現地性、國策性、綜合性等三種特點，係以分散各地龐大的調查組織為基礎，在「日滿支」地區作實地的綜合調查研究為「大調查部」的主要任務與目標。

1939 年 11 月於東京召開「調查部業務連絡會議」，會議的目的，係依據調查部改組半年多來的經驗，來討論調查部的營運基本方針，與會者有調查部長及本部各調查單位的主管、各地調查機關的業務負責人共 33 人（以這種成員構成而類似這種性質的會議，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此次會議確認「無論什麼場合，應以本質的究明」作為「大調查部」的基本營運方針，同時也強調調查部全體的有機營運與綜合調查。然而在此次會議上，對於有機的營運及綜合的調查，應如何實際加以組織，則沒有充分討論。至於統一的調查方式，自然也尚未達到成熟的階段。<sup>⑦</sup>

1940 年 3 月舉行的「業務擔任者會議」（召集人為綜合課長，與會者為綜合課人員及各地業務擔任者）中，對於統一的調查計畫方法及改組後「大調查

<sup>⑤</sup>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 312。

<sup>⑥</sup> 總裁室文書課長，〈滿鐵調查機關擴充理由〉，見《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 180。

<sup>⑦</sup> 調查部綜合課長，〈調查部業務連絡會議記錄〉，同上書，頁 15、65-90。

部」的基本態度，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從這次會議整理出來的紀錄中可以發現，「大調查部」的基本任務在於「本質的究明」，而又將「本質的究明」規定於「涵蓋日滿支的綜合調查研究」與以「大陸規模為首要的科學的調查研究」，也就是說，必須具有「日滿支」地域的綜合性的科學的研究調查，才是其真正的基本任務。相反地，將當時正在推動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各方策」，認為是一種只重觀念，忽視現實的架空的東西而加以否定，並認定正確的國策，應該以滿鐵調查部所進行的科學的調查研究成果作為依據。<sup>⑧</sup>

「大調查部」的基本任務及調查方針，從上述的會議已顯現出來，尤其特別強調「科學的綜合調查研究」，因此，自1939年7月以後，以上海事務所為中心開始進行「支那抗戰力調查」工作，接著1940年度與1941年度又先後完成「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報告」與「戰時經濟調查報告」，這是「大調查部」成立後，最大規模而且最具代表性的綜合調查研究，非常受到重視。但是這些調查報告卻對日本的體制甚至對日本的國策有諸多的批判，引起日本軍部的不滿，認為「大調查部」的綜合調查是「滿鐵左翼調查的黃金時代」是「左翼調查的最高峰同時也是最後的活動」，<sup>⑨</sup>最後引發「滿鐵調查部的檢肅事件」。<sup>⑩</sup>

然而，龐大的調查部組織內，對於其基本任務及調查方針，卻有各種不同的想法，因為調查部的大部分調查人員都是在具有三十餘年歷史而負有經營殖民地使命的國策機關——滿鐵培養出來的，所以他們在潛意識中，均認為順應國策服務國家才是國策調查組織的任務，而且這種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是以，從「大調查部」開始作業，那些順應國策或接近這種想法的調查人員，即從調查部的營運或調查活動的中心退縮，甚至有一部分人與「科學的調查」保持某種程度的距離。例如1940年度進行的「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強調應著重於「日滿支戰時經濟的各種矛盾的集中表現」，並以科學的態度來探究其「各種矛盾」時，在調查人員之間即出現了躊躇不前與反彈的情緒。相對地，也有人認為「大調查部」的調查活動不應牽涉政策問題，應以基礎的調查

<sup>⑧</sup> 調查部綜合課，〈統一的業務計畫について〉，同上書，頁15-17、97-113。

<sup>⑨</sup>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東京：極東研究所出版會，1944年），頁125、頁145。

<sup>⑩</sup> 請參閱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頁165-175。



研究為主，甚至認為若將通貨膨脹問題從政策的角度來分析，會帶來濃厚的政治色彩等，種種主張或議論，不一而足。「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等大型的綜合調查，雖然是由各地調查機關分擔而完成者，但這並不代表已經整合了調查部內各種意見，使大家的思想、意識趨於統一。事實上，其內部的矛盾，依然餘波盪漾。<sup>①</sup>

當時任職長春支社調查室業務股主任的松岡瑞雄，有鑑於為保持調查活動的科學性，調查部組織有機的營運，順利完成綜合調查計畫，必須糾正調查的態勢，最起碼要把擔任綜合調查的調查人員的思想與意識加以統一，因此他撰寫〈對調查部的任務及組織等基本問題之私見〉一文，發抒其對綜合調查的意義及使命的看法。〈私見〉中，他認為「大調查部」成立之初即已強調綜合調查，而且調查的課題應與全體有關連性，並且要把握時局的隨時變化。他再次強調「科學的調查」就是「綜合調查」，認為調查部的調查態勢，不是在一味追隨當前的現實政策，而也應把現實政策本身視為「嚴密的科學的分析」對象。<sup>②</sup> 松岡的這篇〈私見〉，是以1940年3月間召開的「業務擔任者會議」中的討論作為背景而撰寫的，同時在1941年1月至2月間召開的「業務擔任者會議」中，即以松岡的〈私見〉作為討論基礎而擬定了調查部營運基本方針。此基本方針雖然主張「大調查部」的基本任務「應有助於國策」，但不是追隨國策，而是依據科學的、綜合的調查成果來制訂正確的國策與樹立方向。在營運的基本方針中，過去沒有提過的一點就是強調確立調查部的「指導性」與調查的「自主性」，因為關東軍曾要求將各地調查機關放在其指導之下，調查部之所以強調指導性與自主性，實際上是對關東軍的一種反彈，關東軍也因這種強烈的主張而作了讓步。<sup>③</sup>

前面已經提到，當1940年度從事「日滿支通貨膨脹」的綜合調查時，調查部內曾經意見紛歧，然而由於松岡的〈私見〉與1941年2月擬定的營運基本方針，一時整合了內部的意見，但是到1941年4月，協商1941年度的綜合調查——「戰時經濟調查」時，又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因為自1941年至1942年之

① 《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17-18。

② 松岡瑞雄，〈調查部の任務及組織の基本問題に関する私見〉，同上書，頁18-19、115-138。

③ 同上書，頁20。

間，不僅是調查部多事之秋，時局也有很大的變化；前者是一連串發生彈壓思想的事件，牽連不少滿鐵調查機關的人員，<sup>④</sup> 後者則為 1941 年 12 月發生太平洋戰爭，調查活動所受的干預愈來愈多。1942 年 3 月召開的該年度「戰時經濟調查」幹事會，決定 1942 年度的綜合調查課題為繼續去年度的「戰時經濟調查」，以期作深度的調查。五月間，審議調查要綱甚至將進入確定階段時，北支經濟調查所突然提出「戰時經濟調查與滿鐵調查部之立場」的備忘錄，就調查計畫的基本方針乃至調查的方式強烈地表示不同意見。備忘錄中認為在再生產的過程中，對「日滿支」作全盤的理解是很急切的，所以確認「戰時經濟調查」有必要繼續發展，而且也強調綜合調查的必要性。然而它對身為民間調查機關的滿鐵調查部（滿鐵在名份上是民營公司）的界限作了一些批評，認為調查部作國策性的調查，卻沒有權能，滿鐵既係民營公司，就不必作此類的綜合調查，理應由真正具有國家機關身份的機關去做，何況軍部也不希望調查部去做戰時經濟這一類的調查。<sup>⑤</sup>

這一篇備忘錄可以說是對滿鐵調查部營運的基本方針的一種反彈，也是退縮逃避的姿態的表現。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由於客觀情勢的急劇變化，反映了這種逃避的姿態，不僅存在於北支經濟調查所，甚至已逐漸漫延到其他調查機關。然而調查部總務課（1942 年 2 月合併庶務課與綜合課而設置者，將過去的綜合課成為總務課下的一股）於 1942 年 8 月將各調查機關的意見加以彙總成「綜合調查（舊戰時經濟調查）に關する諸意見覺書」中，仍然肯定過去的綜合調查，無論在調查業務的方式、提高調查部全體的調查水準、調查部的營運、防止調查部組織的解體或政策的立案上，都收到一定的效果。最後的結論則主張今後滿鐵調查的重點應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或對大陸經濟社會的客體條件的調查」上。<sup>⑥</sup> 調查部的調查研究方針由於受到客觀情勢的影響，已作了修正，過去標榜的「純理論的」、「純科學的」調查研究，已漸漸失色。

1942 年 9 月發生第一次「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被檢舉者 34 人，且皆為

<sup>④</sup> 黃福慶，前引文，頁 165-168。

<sup>⑤</sup> 北支經濟調查所，〈戰時經濟調查と滿鐵調查部の立場〉，見《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 23、151-159。

<sup>⑥</sup> 同上書，頁 24。

調查部的菁英，調查部為因應不幸事件與內外情勢的變化，乃於1942年11月在大連召開業務審議委員會，在營運方針中主張在國家的調查機關確立以前，一概維持現狀，又說為了把握事實的正確，仍應作綜合的調查研究，仍然強調「實態的把握」、「客體的究明」與「專才的培養」，這似與以前並無兩樣，然而最後卻認定調查部的營運應以「有助國策」作為前提，強調「戰爭期間必須為調查報國而振作精神」，大連調查本部甚至制定「我們要貫徹調查報國的熱忱，成為建設大東亞的基石，使成為達成公司使命的先驅而挺身邁進」的誓詞，要調查人員宣誓，並希望各地調查機關準此適宜的制定誓詞，並付諸實行。<sup>⑨</sup> 在在說明了調查部的調查態勢已有很大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實因內外情勢的變化所使然。

「大調查部」的調查研究方針的變化一如上述，惟1939年至1942年的確是滿鐵調查機關史上，最活躍的時期，除了大型的綜合調查外，其他大小項目的調查，不計其數，而且調查領域很廣泛，就以1940年至1943年其主要的調查項目及件數，加以列表如下：<sup>⑩</sup>

項目 件數 年度	一般 政治 經濟	農 業	工礦業 及 勞 動	商 業 金 融 及貿易	交 通	地 下 資 源	法制社 會文化 及其他	其他機 關的委 託調查	合 計
1940	4	10	9	12	6	8	4		53
1941	4	8	5	9	3	8	11	19	55
1942	7	9	9	6	2	3	2	7	45
1943	2	4	5	3	4	3	3		24

從上表可以看出1943年的調查件數已明顯減少，這是因為自1943年起，戰局日益吃緊，情勢對日本愈來愈不利，而調查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資料，大部分被列入「軍秘」，得手不易，因此調查機關已漸漸失去了可以安定進行純學問或純科學的調查研究的環境。尤其1943年6月發生的第二次「檢肅事件」，又被檢舉10名調查菁英，更是一次重大的打擊。調查機關在軍方的掌

<sup>⑨</sup> 同上書，頁25。

<sup>⑩</sup> 滿鐵會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四次十年史》，頁490-499。

控之下，本部以及分駐各地的調查人員及調查功能日趨萎縮，過去的活躍與朝氣不僅喪失殆盡，甚至連調查工作也陷於停頓狀態，滿鐵龐大的調查組織可以說不必等到大戰結束，就已經等於宣告瓦解。

### 三、各地區的調查組織體系

滿鐵的調查機關除大連本部龐大的組織外，尙在東北、華北、華南的重要據點部署著調查網，而這些調查組織的名稱有的因時而異，本節所列舉的各地調查組織的名稱，係以1939年前後調查部組織規程中所使用者為準。茲分別介紹於下：

#### （一）北滿經濟調查所

滿鐵調查部成立時（1907.4），即設置了經濟、滿洲舊慣、俄羅斯等三個調查班，由此可知，俄羅斯的調查工作為當時調查部的重要業務之一。但是當時俄羅斯調查班的工作，僅止於翻譯帝俄時代俄人所調查的滿洲資料及滿鐵當局自己購買的俄文資料而已。例如「露西亞經濟調查叢書」、「勞農俄國研究叢書」及「俄文翻譯調查資料」等皆為俄羅斯調查班的重要成果之一。為了因應1917年前後俄羅斯的內外情勢，滿鐵於1917年2月設置哈爾濱公所，藉以掌握俄羅斯情勢，這是在東北地區除大連本部外最早設置的調查組織。因此「北方」調查，形成由大連本部與哈爾濱兩個調查機構進行。在1939年4月調查部改組、擴充以前，大連與哈爾濱雖然在調查上互有交流，但其功能卻各自獨立，也就是說，在東北地區存在著兩個活動個體。<sup>99</sup>

以大連的調查課（1908.12起改稱調查課）而言，自創立（1907年）至九一八事變（1931年）這25年期間，前半期的「北方」調查，一如上述，係由俄羅斯調查班擔任，重點放在帝俄時期的西伯利亞及其接壤地區的調查，後半期則擴大範圍，對俄羅斯作廣泛的調查研究。1932年「滿洲國」成立，為了掌握北滿的經濟實態與防止赤化運動，滿鐵調查課加強對北滿及俄國的研究，由於「經調會」的成立，調查機構的規模更擴大，調查活動更具組織化。「經

<sup>99</sup>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358。

調會」時代的「北方」調查係由第六部擔任，<sup>⑩</sup> 1938年4月調查部成立，翌年4月緊接著調查部改組、擴充，「北方」調查更被加強，第三調查室主管「北方」調查，由10班構成，室長為田中九一，旗下總共有83人。惟「北方」調查著重於情報的蒐集與資料的翻譯，如「蘇聯內的思想傾向」、「對赤軍的批評」、「永久凍土層之研究」等多以翻譯作為題材。<sup>⑪</sup>

至於哈爾濱方面，上面已經稍為提到，為了掌握俄國革命前後的情勢，於1917年2月設立哈爾濱公所，旋於1923年4月改組為哈爾濱事務所，並於所內設置調查課，主要任務在於蒐集與分析有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1922.12.30成立）的情報資料。該事務所於1930年6月歸總務部主管，次年8月，再度直屬總裁室。1935年滿鐵以接收「北鐵」（指中東鐵路，事實上是蘇聯賣給「滿洲國」）為契機，3月間於哈爾濱鐵道局內設置哈爾濱經濟調查所，5月將原來的哈爾濱事務所加以合併。同年（1935年）11月，改稱北滿經濟調查所。此時已將其規模加以擴大，其功能儼然如同「經調會」的派駐該地機關，成為調查蘇聯及北滿經濟的重要據點。<sup>⑫</sup>

北滿經濟調查所成立之初置五班，至1936年產業部時代，置庶務、商工、農林、出迴、礦業、北方、資料等七股，擁有職員、囑託、雇員、傭員等總共有100人以上，實有與大連的產業部互別苗頭之勢。然而1939年4月調查部改組、擴充，北滿經濟調查所被納入「大調查部」傘下，由於大連本部設有第三調查室從事「北方」研究，不少北滿經濟調查所的人員轉至大連本部，因此該調查所的人員萎縮至50人左右，其規模也隨之縮小，僅存庶務、農林、出迴、資料等四股而已。

北滿經濟調查所的調查焦點有二：(1)鑑於北滿產業的開發及拓殖事業的進展，對於「滿洲國」的經濟建設及滿鐵本身的經營上與鞏固滿鐵基礎上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樹立能促進其發展的經濟政策，(2)鑑於蘇聯遠東區及外蒙的動向，對政治、經濟影響的重要性，應探究其真相，並樹立「日滿」兩國因應蘇聯之策。<sup>⑬</sup> 顯示北滿經濟調查所的調查重點是在蘇聯、外蒙、北滿以及西

<sup>⑩</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2387。

<sup>⑪</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15。《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8。

<sup>⑫</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15-416。

<sup>⑬</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79-80。

伯利亞等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其次，北滿經濟調查所的活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圖書資料的蒐集。從哈爾濱事務所移交給北滿經濟調查所時就有藏書15,000冊，加上從「北鐵」接收10,000冊，以及其他藏書，共有30,000冊之多。其中三分之二屬俄文圖書，這些俄文圖書除自「北鐵」接收者外，幾乎都是社員購自蘇聯或歐洲者。<sup>⑭</sup>

## （二）新京（長春）支社

新京支社的前身是新京出張所，設立於1932年11月，最初作為關東軍與「滿洲國」之間的交涉連絡機關，除此，還擔任各種資料的蒐集及「經調會」資料的介紹、其他機關委託之調查事項、新京「經調會」業務月報之編輯等。至於其本身的調查事項，依據1935年度所列者為：(1)「滿洲國」原始產業問題的調查研究，(2)「滿洲國」財政問題的調查研究，(3)「滿洲國」金融問題的調查研究，(4)「滿洲國」礦工業問題的調查研究，(5)交通政策研究等。<sup>⑮</sup>

1936年10月，滿鐵實行職制改革，重點有三：(1)新設鐵道總局，(2)設產業部，(3)設新京事務局。新京事務局就在這次改制下與產業部同時設立的，它也取代了原有的新京出張所。顧名思義，新京事務局係在「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代辦滿鐵業務的機關。該事務局的業務體制是由庶務課、業務課、鐵道課、地方課等四課構成，而有關調查方面則在庶務課之下設有資料股，在業務課之下設有經濟調查股。至於調查業務，非常廣泛，包括一般經濟、交通、財政、工礦業、商業、貿易、金融等調查。<sup>⑯</sup>除此，該事務局的調查業務還必須與產業部的業務取得連繫，尤其對與東北產業開發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調查與計畫的制定、對滿鐵各產業機關的統制業務等，新京事務局在滿鐵內部縱橫面的連繫上，均扮演重要角色。

1939年4月，由於滿鐵調查組織的改組、擴充，新京事務局改稱新京支社，並設置調查室。新京支社調查室之下置四股。該調查室設立之初，規模不大，人數僅39人，1940年以後因「日滿支」的各項調查業務急增，人員也膨脹至104名（其中職員59人），組織也擴大為八股，其中在策畫調查組織改

<sup>⑭</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18。

<sup>⑮</sup> 《昭和10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270-271。

<sup>⑯</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218。

組、擴充時奔走最力者之一的松岡瑞雄，即擔任第一股主任。在「大調查部」傘下的新京支社調查室的調查業務，可歸納為兩個方向：(1)為在大連本部綜合課主持下的「日滿支」區劃的共同課題中，擔任有關東北部分的調查研究，(2)為依據該室自己選擇的課題作調查研究。1943年，新京支社調查室改為新京支社調查局，局長為阿部勇，此時日本的敗相已愈來愈濃厚。<sup>⑩</sup>

### (三)北支經濟調查所

滿鐵於1918年在北京設置北京公所，這是滿鐵最早以華北、華中為對象而成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組織，也可以說北支經濟調查所最早是由北京公所演變而來，其演變的過程頗為複雜。

1918年北京公所成立之初，是把它作為滿鐵對中國政府的折衝機關，1924年伊藤武雄在公所內設置研究室後才開始作調查研究工作。隨著1927年4月國民政府的成立，中國的政治重心逐漸移至南京，與國民政府折衝的任務，於1929年轉移至上海事務所（1911年成立上海支所，1924年改稱上海事務所），原有北京公所的調查室及調查資料，也一併移交給上海事務所，北京公所也因此改稱北平事務所，其調查業務僅止於情報之蒐集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為了因應對華工作，要求滿鐵作各種調查的事項日益增多，於是乃將北平事務所的規模加以擴大充實，嗣又於1935年11月，設立天津事務所，並置調查課，自此以後，滿鐵的調查重心即由北京移至天津。

天津事務所的設置目的在於將滿鐵駐華北的機關如北平事務所、天津分室、濟南分室等置於其管轄之下，以整合在華北的調查活動。天津事務所以「調查為主要任務」作為調查主旨，在廣義上而言，它雖定位於調查機關，事實上它的著重點是在華北協助日本實行大陸政策。天津事務所置庶務、業務、調查三課，而調查課之下設第一股（調查資料、統計、翻譯）、第二股（商業貿易交通、工礦業、財政金融）、第三股（農業、畜產）等三股，從事於各部門的實證研究。因為它採用「在勤員制度」，因此有所謂「駐在員」、「出張員」、「派遣員」等來往於各地，其調查網也遍及華北六省。<sup>⑪</sup>

1937年8月為因應日本軍占領地之擴大，再廢天津事務所，另於北京設

<sup>⑩</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10-412。

<sup>⑪</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頁221-222。

立北支事務局，編制也因之擴大，調查員的足跡遍及青島、濟南、多倫、昌黎、山海關、唐山、北京、遵化、古北口、張家口、張北、德化、商都等廣泛地區。北支事務局擁有精於法律的田中盛枝，精於地質調查、地下資源探查的坂本俊雄等十幾位優秀的調查人員。在北支事務局完成的調查報告或立案文書中，執筆者就有五十多人，可見該事務局配屬不少調查人員。<sup>⑩</sup>

1939年4月，調查部改組、擴充時，北支事務局改稱北支經濟調查所，首任所長為押川一郎。北支經濟調查所主要的任務為配合大連本部綜合課策畫的綜合調查，尤其「戰時經濟調查」是該所的重要調查課題。除此，該所又設經濟平衡、重化學工業、衣料、食品、農業等五個部門，作物量調查，其次，「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也是它的重頭戲。<sup>⑪</sup>北支經濟調查所一直擔荷著很多調查任務，但自1943年以後，來自軍部的干預以及資料取得之不易，終使調查人員的調查熱忱逐漸消失。

#### （四）上海事務所

上海事務所的前身是上海支所，成立於1911年，上海支所是擔任碼頭業務，而不是調查機關。1924年上海支所改稱上海事務所，此時的業務仍然與從前一樣，限於碼頭事務，直至1926年以後才開始調查工作，尤其1929年將北京公所研究室與調查資料移至上海事務所以後，逐漸成為華北、華中的重要調查據點，尤其繼續發刊「滿鐵支那月誌」很受到重視。<sup>⑫</sup>1936年10月上海事務所採行分課制，正式設置庶務及調查兩課。調查課（課長安盛松之助）下設產業（天野元之助）、通商（夷石隆壽）、資料（大塚令三）等三股，顧名思義，就是經濟調查單位。

當時上海事務所的調查目標為：(1)日本對華經濟發展，(2)樹立「日滿支」經濟統合的有效方針及其具體對策，其著力點在於提供華中、華南的調查資料，作為日本擬訂大陸政策的參考。<sup>⑬</sup>上海事務所的調查對象區域，表面上看

<sup>⑩</sup> 石堂清倫等編，《十五年戰爭と滿鐵調査部》，頁44-45。

<sup>⑪</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24。

<sup>⑫</sup> 1924年5月，滿鐵北京公所研究室伊藤武雄主編《北京滿鐵月報》，1929年11月北京公所調查室及資料移交上海事務所時，該月報發行所也移至上海，改題為《滿鐵支那月誌》，1937年4月起又改題《上海滿鐵季刊》。見三輪武，〈經濟調査會から調査部まで〉（Ⅱ），《アジア經濟》29-10（1988年10月），頁76。

<sup>⑬</sup> 《昭和11年度滿鐵調査機關要覽》，頁228。



起來似乎在華中、華南，其實，它對中國任何地區的調查研究都表示關心。

上海事務所的調查工作有一特點，那就是所提出的課題是整體性的，例如1942年主要調查課題「上海工場勞動調查」、「華中礦山勞動調查」或「華中勞動法制比較研究」等，並非侷限於單一地區，而是從整個中國社會的視角上作實證分析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調查研究成果是「支那抗戰力調查」，雖然該項調查是由大連調查部的「支那抗戰力調查委員會」統籌作業，主力卻是上海事務所所長伊藤武雄，調查研究的主要單位是上海事務所。<sup>109</sup> 其次如「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上海事務所也分擔華中地區因蘆溝橋事變所引起的「支那通貨膨脹及其對策」的調查，而該所調查室第一股主任三輪武在此項調查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上海事務所與北支經濟調查所是滿鐵設置在中國本土（關內）的兩個重要調查機關，它們的調查課題，雖因局勢的變化而異，但在調查的過程中，對調查的觀點逐漸形成兩種趨勢：(1)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作中國的研究，(2)從事兵要地誌的調查以及軍事情報的蒐集等，完成具有殖民地本質的公司（滿鐵）的任務。雖然理念不同，但在滿鐵的調查活動中是深具意義的。<sup>110</sup>

#### （五）東京支社

滿鐵東京支社係依據1906年6月7日頒佈的滿鐵組織規程第六條而設立的。東京支社設立之初，並無調查業務，1931年的「支社規程」中也僅置庶務、業務、經理等三課，依然沒有包含調查事項，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對滿政策的重要性升高，日本政府、財界及軍部與滿鐵之間的交涉日漸頻繁，滿鐵當局深感調查業務之必要性，乃於1934年在庶務課之下設置調查股，1936年10月產業部成立，調查股改屬業務課，此時其調查業務大致是(1)一般調查及有關涉外事項，(2)有關情報及資料事項，(3)有關圖書整理及保管事項。<sup>111</sup> 由此可知當時東京支社調查股之中心業務在於蒐集與情報相關的資料。調查股的首任主任為工藤武夫，屬下有菊池清、田中申一、三輪武、倉持博等。

東京支社調查股隨著1939年4月調查部的改組、擴充，設置了獨立的調查室，主事為中島宗一。調查室設立之初，僅設資料股（主任為武藤潔），職

<sup>109</sup> 《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1970年已由東京三一書房翻印出版，全書共573頁。

<sup>110</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24-425。

<sup>111</sup> 同上書，頁404-406。

員有平館利雄、山本駿平、小泉吉雄、發智善次郎，囑託則有橘樸、伊藤律、伊藤好道、森喜一等，都是一時的俊彥。值得一提的是，自1929年起從滿鐵東京支社分離出來成為財團法人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成立於1908年9月），於1939年4月復歸東京支社，擔任南洋、西南亞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調查。

東京支社調查室的調查課題大致上可分為四類：(1)大連調查部綜合課策畫的綜合調查，(2)戰爭末期之戰時經濟調查，(3)接受總力戰研究所的委託調查，(4)調查室本身從世界觀點的角度上所作的調查。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東京支社調查室的調查任務更加繁重，不僅要接受外來的委託調查，而且調查地區也擴大到南洋地區，如(1)將中國大陸及南洋的調查成果提供給日本政府與其他各機關，(2)將日本對中國大陸及南洋的所得資料，進而攝取日本對這些地區所作的有關理論的研究、調查動向及成果，向本部報告。<sup>⑩</sup> 太平洋戰爭末期，交給東京支社調查室的「戰時經濟調查」，因資料的限制日嚴，其中對於有關鐵、煤炭、化學工業的利潤補償機構與稻米的生產費、重工業構成等部門的調查，雖然勉強完成，但對於貿易、金融財政部門的調查計畫，則胎死腹中。<sup>⑪</sup>

滿鐵的東京支社的情形一如上述，但1932年1月「經調會」成立時，「經調會」在東京設置了東京出張所，形成東京有兩個調查單位同時並存的現象。「經調會」東京出張所的調查內容為：分析日本經濟現狀與東北經濟、滿鐵之間的關係，探討「日滿」經濟之量與質，並作「日滿」經濟方策的立案。當時的所長是促成「經調會」之成立最力的宮崎正義，出張所內擁有內ヶ崎虔二郎、戒能通孝、仲矢虎夫、長守善、關口猛夫、戶邊留吉、小森新一等調查經驗豐富的調查人員。東京出張所與其他六十幾個調查機關有連繫，目的是想吸取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經驗，並加以發揚。<sup>⑫</sup>

1936年10月，「經調會」解散，東京出張所也隨之裁撤。1932年至1936年之間，在東京雖有東京支社調查室及東京出張所兩個調查機關，但彼此的調

<sup>⑩</sup> 同上書，頁408。

<sup>⑪</sup> 滿鐵調查部編，《部報》，號17（1943年），頁27。

<sup>⑫</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405。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東京：亞紀書房，1983年），頁40。

查業務有相異之處。前者在當時主要調查業務係以接受其他機關的委託調查或一般調查為主，後者身為「經調會」的駐外單位，當然是依據「經調會」的中心課題，從事與日本的政治、經濟有關的調查，可以說這兩個單位，各具有其獨自的調查功能。

#### 四、結 論

滿鐵創設調查部，係出於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的構想，他對調查部的任務與功能有一段解釋，認為凡近代的企業，如果要有合理的經營基礎，必須從事科學的調查研究。後藤所謂的科學調查研究，並不是要把調查部作為真正為研究而研究的研究機關，而是為配合他所標榜的「文裝的武備」論而來。也就是說，調查部之設置，是為了要使其成為他推行東北殖民政策的輔助機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中日之間的關係比較安定，因此，滿鐵調查機關不但在組織上比較單純，其調查工作也比較單一化，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侵華行動已開始表面化，基於日本國策，滿鐵調查機構的任務也隨之趨於多元化，而「經調會」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產物。「經調會」不僅擔負了「滿洲國」初期經濟政策的立案，而且還派遣具有各種專業知識的「囑託班」前往華北，有組織地進行華北的經濟調查，以期日本侵華時提供更多的情報與資料；除此，「經調會」更應「滿洲國」臨時產業調查局（1935年設立）之要求，派員至該局協助進行東北的農村實地調查，因為「滿洲國」體認到農村是構成東北社會的基礎，如欲將其行政力量滲透到農村，此項調查是非常必要的。「經調會」的任務是多方面的，滿鐵調查機關的調查活動也是在「經調會」時期活絡起來的。然而「經調會」畢竟是關東軍主導下的產物，如果要給「經調會」一個定位，只能說它是關東軍乃至「滿洲國」的經濟參謀本部，其成員是關東軍司令官的幕僚。

1936年成立的產業部，雖然致力於「經調會」留下的東北經濟建設五年計畫的後續工程，但由於其他機關如「企畫院」（1937.10）、「滿業」（1937.12）等相繼設立，剝奪滿鐵不少權限。總裁松岡洋右有鑑於此，乃於1938年4月改組調查部，想藉此力挽狂瀾，尤其1939年4月調查部的改組、擴充（俗稱「大

調查部」），使滿鐵調查機關的調查活動歸於一元化，重振調查功能。在「大調查部」（1939.4-1943.5）時期，調查的地區已涵蓋整個中國，甚至由「圓區劃」擴大到其周邊地區，調查課題亦由過去各自為政的個案調查趨向於大規模的「綜合調查」。「大調查部」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的確發揮了重要的調查功能與擔荷了繁重的調查任務。但是在調查活動的過程中，必須指出一件事實，那就是調查人員的理念未必都是一致，因為調查部內部瀰漫著一股不甘心受日本政府或軍部頤使的空氣，他們在思想上常因此產生歧見，甚至形成對立，然而這種對立，並不是出於彼此利害關係的衝突，而是由於學問理念的相異所使然。

為配合日本的殖民政策及大陸政策所付諸的行動，是締造滿鐵調查部曲折歷史的要因，而其行動的動因如以圖式表示，有幾種流程：(1)基於國策上的需要所作的要求→滿鐵的因應→反映在調查體制上，(2)中國地區的政治、軍事動向→軍部的政策方針→對滿鐵施壓→反映在調查行動上，(3)軍部的獨斷行動→直接對滿鐵強求→反映在調查部的從屬化。<sup>⑩</sup> 上面的流程，說明滿鐵調查部籠罩在軍部陰影之下。其實，滿鐵調查部創設之初，其調查活動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但隨著時局的變遷，這種自主性的調查已逐漸消失。「大調查部」時期的綜合調查，一般認為是出於滿鐵調查人員的構想，是屬於自主性調查，但如果仔細加以探討，調查的基本動因還是受制於主導國策的有關機關。

綜觀滿鐵調查部近四十年的歷史，它的調查課題或調查理念，均因時局的變化而異，當然這種變化與政府的國策息息相關。例如早期的調查部(1931年以前)在後藤新平的「文裝的武備」方針下，孜孜致力於「滿洲的文明開化」，九一八事變後，則傾全力於「滿洲國」的經濟建設與產業開發。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以東北為滿足，其野心在想征服整個中國乃至東南亞，調查部之所以從事有關東北、中國甚至亞洲問題的研究，與日本的侵略行為有著密不可分之關連。因此，如從調查部的調查動因、活動、動向及組織的變遷加以探討，也多少可以瞭解日本政府國策推移之所在。

<sup>⑩</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336。